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第 129 期

2013 年 2 月 15 日

目 录

【论 文】

建国后的新疆研究状况分析报告 菅志翔

新疆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的语言能力、
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 孟红莉

性行为与艾滋病感染风险
——新疆少数民族艾滋病性传播现状的社会学定性分析 祖力亚提·司马义、曹谦

【书 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王柯著)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建国后的新疆研究状况分析报告

营志翔¹

一、研究目的、研究范围和方法

(一) 研究目的

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国政府部门关心学术研究的最主要的目的,在于考察学术生产是否符合国家的整体战略部署、法律制度和各项政策的要求,在党和国家允许的范围内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尤其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是否在意识形态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社会影响方面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政府部门关心的主要方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的新疆研究一直处在科研和宣传部门的有效管理下,因此,从政治立场和宣传的角度来评估建国以来的新疆研究,不是本项课题的任务。

从现代化启动和社会动员的人口特征角度来看,无论在其原发地还是在后发展社会,无论是一个社会的主动追求还是被迫适应,现代化都首先由知识分子发动,之后才蔓延到黎民大众之中,而且现代化的进程几乎都控制在社会中相互间紧密结合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手中。因此,知识生产往往是观察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观察这一过程中大众的知识面貌、理解和行为方式,以及这一过程走向的重要领域。

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多年来,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以及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各项研究所生产出来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知识,已经在少数民族干部群众中产生深刻影响。当前我国安定团结的民族关系政治局面以及少数民族社会和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与少数民族群体的自我意识和人们用来认识和分析现实问题的社会历史文化知识有关,亦即与我国民族研究和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状况有关。

从这种视角考察建国以来的新疆研究,对于当前的民族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一视角出发,相对于科研管理和宣传部门,国家民族工作部门在民族研究方面的管理职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注具有文化和历史特殊性的少数民族群体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状况,了解并深入理解和解释他们的特殊处境、特殊困难和问题及其产生和发挥影响的作用机制,为国家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相应的专门政策服务;第二个方面是,关注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是否得到加强,这意味着在重视各民族特殊性的同时,在各民族中建立国家认同和公民意识,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障各族公民个人及各民族文化和谐相处。也就是说,国家民族工作部门的科研管理的目标应该是:既要保证相关领域的知识生产能够满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保证全体国民对我国各少数民族有全面深入的认识,又要保证有关“民族”的知识生产始终与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增进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接纳的需要相一致。

由于知识生产出来以后,需要经过社会的筛选、传播和消化,才能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和未来走向,因此,与知识生产相对应的社会实效,

¹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副教授。

往往滞后产生。我们可以借助这种特征，透过分析知识生产状况来预测社会心理和观念行为的未来趋势。

基于这种理解，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有：

1. 考察有关新疆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生产状况；
2. 考察全国范围内的新疆研究状况，以此来分析我国知识界对新疆的认识水平；
3. 考察有关新疆的知识生产与国家建构、新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的关系；
4. 评估建国以来的新疆研究及其影响。

（二）研究范围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在第一个方面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是我国的新疆研究是否为新疆各民族认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理解现阶段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变、准备迎接本民族社会的巨大转型提供了全面、恰当、丰富的知识和思路，为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而成为全国人民生活一部分的多语言、多文化日常互动提供了充足的正确的价值理念、具有相应深度的知识储备和行为指导。由于各地各族人口在全国范围流动的规模和频率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加大，这需要我们不仅关注新疆一个地区的研究状况，也要关注全国范围内对新疆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状况，以此考察作为我国各民族相互关系基础的知识状况。

而民族工作部门科研管理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在抓好第一个方面工作的基础上，在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建构中，担负起处理好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与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传统信仰、国家主体文化与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文化、国家历史叙述与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具体的历史记忆、全民共享现代文化与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现代公民意识与各族社会传统的身份意识等等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现代国家建构中必须处理好的重大关系的责任。围绕民族工作的这一职责，本课题将考察建国以来新疆研究在相关方面的状况，评估相关学术生产与国家建构需要之间的关系。

基于这一思路，本项研究所做的是内容分析，以建国以后的学术出版物为研究对象，包括正式出版的学术图书和学术期刊以及研究项目。课题主要考察的文种包括汉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和柯尔克孜文，考察的学科涵盖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各主要分支，时间范围为 1949 年至 2012 年。

由于时间、人力和财力的限制，我们在 CSSCI 期刊中选择了 70 种学术期刊¹进行研究分析，在可以查阅到的范围内，统计了所选期刊自创刊以来所发表的与新疆有关的所有文章（详见附表 1），总结建国以来新疆研究关注的主要议题、相关研究的学科和地域分布以及学术生产的数量，以期得到关于新疆研究的学术论文的整体面貌。在此基础上，本课题还将尝试探讨学术生产与社会意识和大众心理的关系、社会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关系、知识结构与知识生产和社会心理的关系，以期提出问题，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思路。对于建国以后出版的研究新疆的学术性图书的研究，也将按照上述方法进行（关于各学科期刊中的新疆研究状况，以及图书中反映出的新疆研究状况的详情，请参阅报告附件 1-16）。由于学术期刊的网络资源丰富，本报告的内容分析将以学术期刊为主。

（三）研究方法和设计思路

本项研究对建国以来新疆研究的评估，以内容分析为主，通过对不同专业领域用不同文种发表或出版在不同地域的涉及新疆研究的出版物的内容结构的比较，来描述和评估建国以来我国的新疆研究状况，不涉及具体研究的学术水准的评估，也不涉及到具体的学术观点。

¹ 选择期刊时考虑到了期刊的代表性。但由于人力限制，实际研究的期刊未能覆盖最初选择的样本，造成分属地分学科期刊覆盖不完整。例如，中央所属机构学术刊物中缺经济学等问题。

1. 地域范围的确定：本研究中的图书分析资料出自《全国总书目》，其研究结论覆盖全国。基于“更具有全国性的期刊会更多地关注其所在地区范围之外的其他地区的研究”这一假设，我们在 CSSCI 中选取期刊时首先选择了在刊名中没有地域限制的学术期刊。因此，统计结果反映出的所选期刊的地域分布，也部分地反映出我国不同专业学术研究重镇的地域分布。由于我们在选择期刊时具有这样的倾向性，通过地域分布的分析得到的结果可能会有一定偏差，这在报告的相关部分将会进行讨论。

2. 文种选择：在我国，涉及新疆研究的学术成果主要以汉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语文出版或发表。我国 56 个民族生活在同一片国土上，在同一个经济体中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共同努力。随着人口流动和社会交往，人们的生活中会越来越多地面对文化多样性问题，各民族都应当对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生产方式有全面了解，学会相互尊重和沟通。考察少数民族文字的学术出版物中有关新疆的研究状况，也是了解我国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关心程度的一个窗口。但是，由于受到课题团队工作语言结构的限制，本课题主要进行的是汉文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兼有少量维吾尔文学术期刊的分析。维文的研究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维吾尔族以及以维吾尔语文为工作语言的知识生产状况。由于蒙古族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具有完整的本民族语言文字教育和出版系统的少数民族之一，对几种内蒙古版的学术刊物的相关统计可以作为一个案例，折射出我国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关心和比较研究的状况。

理论上讲，在本项研究中，少数民族文字的学术出版物应当被赋予与汉文相应的权重。但由于内容分析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训练，能够熟练使用少数民族语文在社会研究领域从事研究的人员十分稀少，虽然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寻找合适的参与者来做基础的内容统计，但结果很不如人意。这也反映出我国民族研究领域的一种现实格局——即使在认识上能够做到重视对少数民族的充分关注，在实际操作中也很难实现相应的工作构想。课题研究中遇到的这些困难，本身也反映出 60 年的知识生产所累积的一种结构性现实。

3. 专业范围：新疆不论在国土面积、地理位置、资源分布、地缘政治，还是在人口结构和文化构成上，都是我国具有突出战略地位的一个省级自治区，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多样性、复杂性的大型区域社会。因此，对新疆的研究应该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展开，各专业方向都有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切入来开展新疆研究的责任。按照 CSSCI 的专业划分，本项研究涵盖了被归入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范围的专业方向，能够反映新疆研究的专业分布状况。由于研究工作量大，课题组成员不可能分地域对所有专业进行统计，这影响了数据的比较分析。

由于文献调查范围很广，本课题组成员以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和民族社会学专业的 18 名硕士研究生为主，开展有关图书和期刊的内容统计和分析。没有他们的紧张投入，本课题的研究设计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受到时间紧张和检索条件的限制，多数选中期刊的内容统计也是不完全统计，这影响了我们对统计结果的进一步分析和判断（图书统计结果详见附件 1 和 2，期刊统计情况见附表 1）。

4. 时间跨度：本课题考虑到对建国 60 多年来新疆研究状况的分析，在数据资料统计上也充分注意到时间点的代表性问题。由于我国绝大多数学术期刊和图书都出版于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前的学术生产处于严格的计划体制管理下，不仅数量少，种类也不多，且全国各地和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也极小，与改革开放之后的学术生产状况相比，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内容分析价值¹，因此，本报告研究的重点，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后新疆研究的状况。

由于上述研究设计、条件现实和研究者自身的缺陷，本报告在研究深度和涵盖面方面的不足

1 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之一，虽然从内容分析的角度看分别研究两个时间段并加以比较的分析价值不大，但从文本分析角度看，比较改革开放前后相关学术研究在理论方法、观念意识、话语方式以及叙事结构上的变化，是理解我国民族关系演变和判断其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思路。这项研究的难度和工作量都十分巨大，应当另立专项研究。

之处难以避免，因此在讨论中提出的观点仅供参考。

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新疆研究

建国以来，新疆已经建立起包括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语种的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科研体系和出版体系。新疆的大中专院校和科研院所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当地社会文化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在 2009 年新疆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口中，教育和科研单位从业人员所占比例达 15.17%，略高于同期全国城镇就业人口中教育和科研从业人员所占比例（15.00%）。其中科研单位和高校的科研人员 14,339 人，占专业技术人员的 3.48%。而全国这一比例是 3.58%。从这两个数据来看，在新疆当地从事知识生产的科研机构 and 科研人员的规模发展状况与全国水平非常接近。但考虑到多民族、多语种、多种经济生产方式并存的基本区情，新疆的这些数据应当远高于单一使用汉语的省区，才能满足当地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因为在相同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基本设置条件下，只有各民族的知识普及、信息服务和文化调适到位，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才能均衡健康地运行。

由于相关统计资料缺乏，我们无法分析新疆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的专业结构，以此来了解新疆科研学术领域的知识生产的专业分布，而分析新疆学术类期刊及其中相关研究论文的发表状况，则可以大致勾勒出新疆当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状况。当然，这种研究策略的缺陷是，只能做描述性分析和理论推测，努力展现一个层面的现状并提出更深一个层面的问题，而不能做实证的说明性和解释性研究，这就使得相关对策的提出，只能基于工作经验和学术直觉，且较为宏观和笼统。也就是说，基于这项研究尚不能做进一步的强调准确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研究。正是考虑到这层问题，本项研究的一些相对具体的对策建议只能根据分析中遇到的问题，就事论事，以脚注的形式提出（见脚注中的楷体黑体部分）。

（一）数量

1. 学术期刊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出版局 2011 年 4 月的工作报告¹，全疆共出版期刊 207 种，其中学术类期刊 37 种，占新疆期刊总数的 17.87%。

在收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2010-2011 年来源期刊目录（CSSCI）的 700 种学术期刊中，新疆的期刊有《新疆社会科学》、《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西域研究》、《当代传播》5 种，占该索引收入期刊总数的 0.7%。在新疆区内出版的 37 种学术类期刊中，收入该索引的这 5 种占 13.5%²。

以这 5 种收入最新版 CSSCI 的刊物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新疆的学术期刊的办刊规模、刊发学术论文的数量与全国整体水平非常接近³。从表 1 可以看到，虽然新疆的这 5 种期刊都不属

¹ http://www.xjpp.gov.cn/cszz_news.aspx?Id=554, <http://shashou008.banzhu.net/article/shashou008-62-2185128.html>。

² 据中国知网自己的统计（<http://acad.cnki.net/Kns55/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截至 2011 年 6 月，该网共收录国内学术期刊 7700 多种，全文文献总量 3200 多万篇。其中，核心期刊收录率 96%；特色期刊（如农业、中医药等）收录率 100%。如果以该网收录的期刊总数来比较，CSSCI 收入期刊的比例不到全国总数的 10%，新疆版学术期刊收入的比例高于全国。

³ 当然这是基于新疆与全国其他省区的同质性假设做出的判断。事实是，包括新疆在内的我国各民族省区都有各自的特殊性。在国家政治层面和经济技术层面考虑问题时，从这种同质性假设出发，遇到的问题可能会相对少一些，而在社会、文化和教育领域忽视了各地的差异性，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对问题的判断可能会偏离现实，各项政策的实际效果可能就会南橘北枳，甚至南辕北辙。由于我国的国家统计、部门统计和行业统计体系中的民族统计信息极不完备，基于现有统计资料所进行的分析，即使是专门的民族研究，也只能基于同质性假设进行，这是我国的少数民族的特殊状况不能为全社会所认识、不能有效纳入各部门的工作视野中的一个重要原因，需要予以高度重视。这是一项看似与民族工作无关的事务，但却是整个社会正确认识国情、充分

于办刊历史很久的期刊，但它们刊发的学术文章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中国知网收录的学术期刊包括自 20 世纪初创办的刊物，所有刊物总计平均每期刊发文章 4156 篇。以此为参照，新疆的 5 种核心期刊中有三种发文数量接近这一平均数。

表 1. 新疆的全国核心期刊刊发文章的数量和结构

学科领域	期刊名称										总计	
	新疆社会科学		新疆大学学报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西域研究		当代传播			
	篇数	%	篇数	%	篇数	%	篇数	%	篇数	%	篇数	%
哲学人文	686	24.7	2366	51.6	1743	43.8	1192	76.8	232	5.8	6219	36.7
社会科学	1075	38.7	1122	24.5	1251	31.4	98	6.3	251	6.2	3797	22.4
信息科技	41	1.5	423	9.2	359	9.0	42	2.7	3230	80.2	4095	24.2
经济与管理科学	976	35.1	674	14.7	631	15.8	220	14.2	313	7.8	2814	16.6
篇数合计	2778	100.0	4585	100.0	3984	100.0	1552	100.0	4026	100.0	16925	100.0

2. 图书

通过对《全国总书目》的检索统计，在 1949 年到 2003 年期间出版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学艺术、考古、历史、地理、教育、宗教等有 9 类汉文图书中，可以明确判断是以研究新疆为主题的图书共 589 种（详见附件 1），其中，新疆出版图书 420 种，占这类图书总数的 71%，占同期全国出版图书总数的 0.027%。

在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收录的 1980-2010 年出版图书中，以主题词和出版社相结合的方法，检索到包括主题词为“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两者经比较差异主要在舆图的收集量方面）、“边疆”、“西北”、“恐怖主义”等的图书，以及通过限定出版社的方式人工筛选出新疆研究相关图书，共检索到 860 条图书记录，其中新疆出版的图书 640 种，占 74%（详见附件 2）。

两种检索方法得出的结论非常一致。由于第二种检索方式对越晚近的图书信息越具有敏感性，新疆版图书数量的变化也反映出近年来新疆研究的学术著作的出版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二）文种结构

在中国知网的来源期刊中，按出版地统计，共收入在新疆出版的期刊 79 种，其中一种是英文版，但不包括民文版期刊。这种状况使得该网对自己收录文献状况的描述“特色期刊收录率 100%”具有反讽意味——在具有 56 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中，民族文字出版的期刊既不是一般性期刊，又不是特色期刊，知识界对多民族基本国情的无知或无视，由此可见一斑。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2010-2011 年来源期刊目录中也没有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也就是说，在汉语信息系统的一般性的学术检索中，以少数民族文字发表的学术作品没有被纳入视野，或者说被排除在外。这种状况使得不懂民族语言的研究者无从了解少数民族学者使用本民族语言所进行的研究工作，开展学术交流和比较研究。在汉语学术圈与少数民族语文的学术圈之间，存在着一般学者无法跨越的信息沟通障碍¹。也正是由于这种状况的存在，本项研究无法系统地对用民族文字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内容分析。

重视少数民族特殊性的前提条件。当前的民族工作应当把重点放在这些基础领域的建设上。

¹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加强文献信息资料服务中少数民族文种的信息转译工作来解决。一方面需要所有民文期刊刊出汉文目录，另一方面需要在文献信息资料服务部门，如各大图书馆和信息服务网站，增加可以熟练使用民文和汉文的专业人员。有了这两方面的基础，有关部门就可以要求相关的信息服务和学术评估机构提供民文信息检索服务这一现代多民族国家应当达到的基本要求。只有在国家的相关信息服务部门做到有效涵盖我国少数民族语文信息检索服务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要求包括学术研究在内的各部门、各行业充分重视我国的族群问题，并将对族群问题的关注程度作为一项基本指标纳入学术、社会及政策评估体系中。从本报告的分析将可以看出，这项看似没有什么直接效益且服务人口很少的设置，实际上对于加强国家整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出版局 2011 年 4 月的工作报告¹，全疆共有期刊 207 种，用 7 种文字出版发行。其中汉文 94 种，维吾尔文 70 种，哈萨克文 33 种，蒙古文 5 种，柯尔克孜文 2 种，俄文 1 种，英文 2 种。少数民族文字期刊占总数的 53%。

在 2012 年通过中国邮政乌鲁木齐局发行的新疆版 163 种杂志中²，少数民族文字杂志为 103 种（详见附表 2），占新疆当地主办期刊的 63.2%。其中，维吾尔文期刊共 59 种，占 57.3%；哈萨克文期刊 36 种，占 35.0%。在 163 种期刊中，学术类期刊共计 63 种，其中少数民族文字版期刊 31 种，占新疆版学术类期刊总数的 49.2%，占新疆版少数民族文字期刊总数的 30.1%（疆版汉文期刊中学术类的比例是 53.3%）。在疆版维吾尔文期刊中学术类占 32.2%，哈萨克文、蒙古文和柯尔克孜文的这一比例分别是 25%、33.3%和 50%³（详见表 2）。

表 2. 新疆出版少数民族文字期刊统计表

文种	维吾尔文		哈萨克文		蒙古文		柯尔克孜文		合计	
	种	占本文种%	种	占本文种%	种	占本文种%	种	占本文种%	种	%
学术类	19	32.2	9	25	2	33.3	1	50	31	30.1
时政综合类	14	23.7	8	22.2	2	33.3	0	0	24	23.3
生产科技类	6	10.2	4	11.1	1	16.7	0	0	11	10.7
教育、科普和生活类	7	11.9	7	19.4	0	0	0	0	14	13.6
文学艺术类	13	22.0	8	22.2	1	16.7	1	50	23	22.3
合计	59	57.3	36	35.0	6	5.8	2	1.9	103	100

在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期刊中，学术期刊的比例都高于其他类别的期刊，其次是时政综合类和文学艺术类。从期刊的数量和种类结构来看，少数民族学者在平面媒体中的学术发表和其他话语空间还是比较大的。笔者多次实地调查的观感是，新疆少数民族作者只要勤于耕耘，发表并不是问题，甚至使用民族语言写作比用汉语写作更容易发表。一定数量学术期刊的维持，可以说明学术生产的数量。

（三）专业结构

在中国知网的来源期刊种，按出版地统计，共收入在新疆出版的期刊 79 种。按学科分类统计，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类 25 种，占该网收入新疆期刊总数的 31.6%。在对新疆的 5 种 CSSCI 核刊发表的文章的学科分类统计中可以看到，人文哲学类文章占比例最大，达 36.7%；其次是科技信息类，占 24.2%；社科类占 22.4%，经济和管理科学类占 16.6%（详见表 1）。由于人文哲学、科技信息，以及经济和管理科学领域的绝大部分研究成果都不是仅关注一个区域（如新疆）范围内具体的社会状况的，我们可以据此估计，在新疆当地出版的学术文章中，大概只有四分之一是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现实社会问题的。

表 3. 新疆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的学科分布

文种	维吾尔文		哈萨克文		蒙古文		柯尔克孜文		合计	
	种	占本文种%	种	占本文种%	种	占本文种%	种	占本文种%	种	%
人文社科类	9	47.4	6	66.7	1	50	1	100.0	17	54.8

¹ http://www.xjpp.gov.cn/cssz_news.aspx?Id=554, <http://shashou008.banzhu.net/article/shashou008-62-2185128.html>。

² 资料来源：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http://bk.chinapost.com.cn/catalogSearch.do?method=findCatalog>）。

³ 新疆版汉文期刊只占全国发行的汉文期刊的一小部分，汉文读者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自己需要的信息。而新疆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柯尔克孜文期刊却是我国这些语言文字期刊的全部。由此可见少数民族语种的信息传播能力及其专业覆盖面的现实状况。少数民族文种媒体的数量至少应当满足民族语言文化传承和培养语言转用能力的基本要求。这也是一个需要专门调查研究的重要问题。

自然科学	5	26.3	0	0.0	0	0	0	0.0	5	16.1
医学	4	21.1	2	22.2	0	0	0	0.0	6	19.4
语言学	1	5.3	1	11.1	1	50	0	0.0	3	9.7
小计	19	100.0	9	100.0	2	100.0	1	100.0	31	100.0
合计	19	61.3	9	29.0	2	6.5	1	3.2	31	100.0

表3是新疆版少数民族文字学术期刊的学科分布,人文社科类占64.5%,接近三分之二。考虑到自然科学和医学有着广泛的研究领域和社会需求,这种分布说明新疆以民族文字为工作语言的学术研究大部分集中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这个领域集中的学术资源是相当丰富的。

新疆是我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最复杂的地区,在社会生活、信息传播以及教育系统中的语言现象是认识和把握新疆社会文化动态、社会心理和民族关系的非常重要的面向,需要认真加以研究。但在我们采用的2008-2009年度CSSCI学术期刊中,语言学期刊共计30种,新疆没有一种入选。教育学方面也一样,全国共计收入51种,新疆无一种入选。在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蒙古文期刊中,语言学类的专业期刊都只有一种,且都是《语言与翻译》这一种刊物的不同文版。在我们所能检索的范围内,新疆本地版的语言学专业学术期刊实际上只有这一种,用汉、维、哈、蒙四种文字出版。

对于新疆当地的新疆研究成果的专业结构,可以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期刊发表文章的内容结构来做更详细的考察。

《新疆社会科学》

《新疆社会科学》是新疆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权威刊物,是新疆本版学术刊物中的“领导者”。在该刊自创刊到2011年期间,笔者每隔6年选取一年度¹全年刊发的文章,进行内容结构的统计分析。由于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课题往往涉及多个研究方向,在专业上普遍具有交叉性。在统计中,每篇文章都根据其内容选择一到三个关键词,再对关键词进行学科归类。如“新疆中亚留学生的汉语学习特点研究”一文,其内容涉及政治学(国际关系)、教育学和语言学;“延安时期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探析”一文则涉及历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由于在我国的学术体系中,民族学是一个以研究对象来确立的“学科”,凡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相关的研究或涉及民族问题的研究都可视作“民族学”,几乎与其他所有学科都存在交叉的问题。新疆研究在地域范围上讲属于民族地区,在社会事实层面讲,几乎都涉及少数民族或民族关系,在社会行动者层面上看也都涉及少数民族或族际互动,因此,可以整体地归入当前我国学术管理体系中所定义的“民族学”中,单列出来没有统计意义,并会影响学科分类统计数据的效度。与之相应,学术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民族学研究、民俗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等,却没有其它相应的学科用来进行归类统计,本项统计中的民族学实际上指人类学、民俗研究、文化研究及民族志。例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归入政治学,民族区域自治法研究归入政治学和法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归入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学,等等。例如《现代维吾尔语“抽象名词+siz结构”的宗教文化透视》的关键词学科归类为语言学、宗教学和民族学(文化研究),《“泛突厥主义”文化观评析》归入政治学、文化研究、哲学。由这里列举的例子可以看出,统计的学科归类是非常宽松的,“只要沾点边”就统计,每篇文章最多统计三个关键词。这样一来,不会因统计口径的严苛而出现低估问题。

上述所选7个年度的《新疆社会科学》共35期,刊发文章810篇,这些文章的内容结构统计结果见表4。

表4. 《新疆社会科学》刊发学术文章的内容结构*

文章涉及专业方向**	新疆研究	一般性研究***	合计	本专业中新疆研究所占%	各专业所占%
------------	------	----------	----	-------------	--------

¹ 这样选出的是2011年、2005年、1999年、1993年、1987年(以上每年各出版6期)和1981年六个年度。由于该刊1981年只出版一期,无法考察改革开放初期新疆社科领域的研究状况,为更准确反映1980年代初该刊的状况,笔者补充统计了1982年度,并将1981年度和1982年度的5期统计结果合并计算。

经济学	190	167	357	53.2	31.0
政治学	72	138	210	34.3	18.2
历史学	74	18	92	80.4	8.0
社会学	48	41	89	53.9	7.7
法学	8	64	72	11.1	6.2
民族学	23	23	46	50.0	4.0
哲学	1	41	42	2.4	3.6
教育学	21	13	34	61.8	2.9
宗教学	14	19	33	42.4	2.9
中国文学****	30	2	32	93.8	2.8
语言学	22	8	30	73.3	2.6
管理学	2	18	20	10.0	1.7
马克思主义	0	20	20	0.0	1.7
新闻学与传播学	3	12	15	20.0	1.3
环境科学	8	6	14	57.1	1.2
考古学	13	0	13	100.0	1.1
人文、经济地理	11	1	12	91.7	1.0
心理学	4	6	10	40.0	0.9
艺术学	3	3	6	50.0	0.5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2	2	4	50.0	0.3
统计学	0	1	1	0.0	0.1
体育系	0	1	1	0.0	0.1
外国文学	0	0	0	—	0.0
合计统计频次	549	604	1153	47.6	100.0

* 本表数据是对文章关键词代表的研究对象或研究方法所属学科出现的频次统计及计算结果。资料来源于中国知网的期刊目录。

** 学科分类采用 2010-2011 年度 CSSCI 期刊目录中的分类。其中社科综合和高校学报类不是学科分类，未加采用。

*** 研究对象为一般性抽象概念、全国性综合对象或不属于新疆当地。

**** 新疆的中国文学研究以新疆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为主，并涉及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而一般性中国文学研究指新疆区外的或纯汉语文学研究。

新疆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经济学和政治学占了近一半。由于经济研究往往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这两个学科实际上主要从事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研究。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交叉领域管理学和重要研究工具统计学出现的频次上，这一点也可以得到印证。而能够反映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训练程度的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出现频次，则反映出相关研究在视角和方法上的特点。新疆是一个多民族省区，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面向面临着全新的历史机遇和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新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同时也体现在社会、文化、心理等多个层面，需要包括政治、经济、司法、教育、文化、社会服务等各个社会部门的协调发展和通力合作。新疆研究的这种专业分布结构显然与现实需要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新疆与中亚五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外蒙古接壤，在语言文学和历史文化方面有许多相通之处，新疆学者研究这些国家的文学艺术具有天然的便利条件。但是，在我们统计的 7 个年度里，《新疆社会科学》竟然没有发表一篇有关外国文学的论文。这说明，新疆当地学者文化关注和比较研究的视角还有结合地区优势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一般来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关注点往往与全社会的热点和动向密切相关，并且有相互塑造的效应。表 5 反映了《新疆社会科学》自创刊以来所发文章专业结构的变化趋势。经济学研究在 1990 年代占到半壁江山，很好地反映了那个年代“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潮流。与经济学的热门形成反差的是历史学，数据显示整个 90 年代新疆历史学的研究处在谷底。以新疆民族文学为主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比历史学更为惨淡，在 90 年代的两个年度里竟然没有涉及。而这一时期法学研究则相对活跃一些，之后十年法学研究的相对萎缩倒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

六个时间点上的统计基本反映出，新疆当地学术研究专业结构的变化从历史学和政治学转向

经济学的可能性非常大，内容统计过程中的直观印象也是，政治学和历史学取向的经济问题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占的比例非常高。

2011年与2005年相比，表5中统计的5个关注度最高的专业方向的比例都呈下降的趋势。而相应的一些过去一直偏冷的专业方向的研究成果有上升的趋势，其中宗教学、教育学、民族学、新闻学和传播学、语言学、中国文学的增长较为可观。这显示出新疆学术界正在调整研究的关注点和学科专业结构，向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表5. 《新疆社会科学》刊发论文专业结构变化趋势

学科	统计项目	年份					
		1981、82	1987	1993	1999	2005	2011
经济学	合计	17	61	119	71	41	48
	新疆研究	11	29	55	38	28	29
	一般研究	6	32	64	33	13	19
	本专业中新疆研究所占%	64.7	47.5	46.2	53.5	68.3	60.4
	在各专业中所占%	14.8	29.9	52.9	45.5	24.6	16.8
政治学	合计	20	43	37	25	35	50
	新疆研究	12	14	4	8	18	16
	一般研究	8	29	33	17	17	34
	本专业中新疆研究所占%	60.0	32.6	10.8	32.0	51.4	32.0
	在各专业中所占%	17.4	21.1	16.4	16.0	21.0	17.5
历史学	合计	34	28	1	1	12	16
	新疆研究	29	27	1	1	7	9
	一般研究	5	1	0	0	5	7
	本专业中新疆研究所占%	85.3	96.4	100.0	100.0	58.3	56.3
	在各专业中所占%	29.6	13.7	0.4	0.6	7.2	5.6
社会学	合计	4	5	16	13	21	30
	新疆研究	1	2	13	13	13	6
	一般研究	3	3	3	0	8	24
	本专业中新疆研究所占%	25.0	40.0	81.3	100.0	61.9	20.0
	在各专业中所占%	3.5	2.5	7.1	8.3	12.6	10.5
法学	合计	2	10	16	13	12	19
	新疆研究	0	0	0	3	2	3
	一般研究	2	10	16	10	10	16
	本专业中新疆研究所占%	0.0	0.0	0.0	23.1	16.7	15.8
	在各专业中所占%	1.7	4.9	7.1	8.3	7.2	6.7
本年度5专业合计	合计	67	147	189	123	123	163
	新疆研究	43	72	89	63	78	63
	一般研究	24	75	100	60	45	100
	5专业中新疆研究所占%	64.18	48.98	47.09	51.22	63.41	38.65
本年度各专业合计		115	204	225	156	167	285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维文版

课题组中只有一位能使用维吾尔语文的成员，虽经多方努力寻找能够承担课题任务的维吾尔族研究生参与，但都没有形成可供使用的成果。这位维吾尔族成员对《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维文版做了统计分析（详见附件3）。在所检索的31期483篇文章中，占比例最高的是语言文学专业，文章数为155篇，占32.1%；其次是西域文化研究，文章103篇，占21.3%；接下来是经济与政治研究，文章数分别为58篇与45篇，占12.0%与9.3%；历史研究35篇，占7.2%；其余学科文章所占比例都小于5.0%，其中教育3.1%，社会学2.3%，宗教研究0.4%。语言文学、区域文化和历史研究占到该刊发文总数的60.6%¹。新疆大学是新疆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

¹ “西域”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在我国的学术概念中，“西域文化”属于历史范畴。作为一个学术性的当代地理概念，“西域”主要被用来彰显与“新疆”有所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内涵，包含着非常复杂甚至往往是截然相反的取向。“西域文化研究”这样一个栏目及其所占的比例，以及与“历史研究”并列这样一种结构，给笔者

理论上讲,《新疆大学学报》刊发非语言文学、区域文化和历史类论文的比例应该是新疆各类大学学报文科版中最高的。据此我们也可以估计,在人文社科领域,新疆各大学以民族语文发表的研究成果中,语言文学、区域文化和历史研究所占的比例可能超过三分之二,而研究社会、经济、政治领域现实问题的成果则低于三分之一,其中对教育、社会和宗教这些热点的研究成果所占比例都远低于5%¹。

为了弥补民族语言能力方面的缺陷,2010年暑假期间,我们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和阿勒泰地区走访了一些重要的哈萨克族知识分子,通过他们了解使用哈萨克文进行的相关知识生产状况。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是,除个别人之外,人文社科领域的哈萨克族知识分子都是从事语言文学和历史文化研究的,哈萨克文出版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成果至今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用少数民族语言发表的学术成果中,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只占五分之一,语言文学和历史研究超过三分之二;用汉语发表的学术成果中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占近一半,历史学和文学、语言学总计只有七分之一。新疆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的学术研究的内容结构与汉文版的《新疆社会科学》形成鲜明对比²,少数民族与非少数民族的“二元结构”在学术生产方面同样存在。这种现象说明,长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培养的专业结构有很大偏差,学科建设中没有做到充分考虑多民族的基本国情,因此,二元结构当中的一元——民族系统——的内部化运作难以有效促进研究事业的健康均衡发展。

如果说学术期刊是应学术交流和传播的需要而创办的,那么,这类期刊的专业结构也反映着学术生产的结构。从表3中可以看到,在维吾尔文学术期刊中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类基本各占半壁江山;而哈萨克文期刊中大致是四分之三人文社科、四分之一医学;蒙古文和柯尔克孜文期刊均不涉及理工科。民文期刊的这种专业结构使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假设:在我们的学术出版中没有覆盖的那些领域,要么客观上不存在相关专业的研究活动,要么相关的研究只能借用其他语言工具,参阅汉文或外文文献,以汉文和外文发表。对《新疆社会科学》(汉文版)的内容分析显示,少数民族学者发表的文章所占比例很低³,除文学、历史、民俗和社会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专业之外,其他专业很少见到维吾尔和哈萨克学者的论文。也就是说,少数民族学者的汉文研究活动和学术发表很不活跃。

如果学术生产的知识可以经由大众读物传播到社会中,并服务于人们的日常生产与生活,那么,非学术期刊的结构则反映出知识分子向社会大众传播的知识结构。表2显示,在直接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生产科技类、教育科普和生活类以及文学艺术类期刊中,文学艺术类的比例较高。哈萨克文期刊中,生产科技和教育科普两类的比例都高于维吾尔文期刊。考虑到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在人口数量和结构上的巨大差异,哈萨克文知识传播的结构和密度都优于维吾尔文。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哈萨克文对其他语种信息的翻译和借用量要大于维吾尔文,前者

的统计归类带来困惑。恰当的归类和更准确的判断需要进行文本分析,这已超出笔者能力所及。

¹ 根据笔者的实地调查体验,造成这种学术研究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相关领域的研究在新疆多被贴上了“敏感”的标签。而这些基本的社会研究议题之所以变得“敏感”,主要原因是多数研究缺乏相关专业领域的学科训练,不能按照学术规范对问题进行理性的、实证的分析,而极易流入就现象谈现象、发表感性言论的窠臼,“敏感”也就在所难免。关于学术研究,我国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即“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因此,笔者认为学术研究中的“敏感”领域,尤其是民族研究方面的“敏感”问题,多数是由于研究队伍的专业结构极不合理造成的——由于缺乏研究问题所需要的专业素养,一般的社会现象得不到充分的学术说明,人们感知到的“社会问题”往往以政治口号和情绪宣泄的方式出现在所谓的学术研究中。这样的“研究”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成为制造问题的重要场所。因此,调整并强化相关领域的专业结构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和科研系统的问题,需要从我国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的高度来认识。

² 《新疆社会科学》还出版维吾尔文版和哈萨克文版。由于人员结构的限制,课题组无法对这两种期刊做内容分析。维吾尔文版和哈萨克文版的《新疆社会科学》与汉文版的《新疆社会科学》有着相同或类似的内容结构还是事实上的“《新疆社会科学(语言文学和文化研究版)》”,不得而知。

³ 由于没有作者的民族成分信息,统计中只能根据名式来判断作者的民族身份,无法做到完全统计。

更具开放性。由于蒙古文出版更多地集中在内蒙古自治区，新疆蒙古族读者可以阅读来自内蒙古的蒙文出版物，他们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状况不是本课题所能完成的，在此不做过多讨论。而柯尔克孜文的期刊出版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文字的实际功能，柯尔克孜族的相关状况需视人们的语言使用情况来确定，但都可以通过他们所能够借用的汉语、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的情况加以推测。

我们还注意到，在新疆当地的学术研究中，法律、管理、传媒以及工商企业经济活动等方面的研究受到的关注普遍不足，而这些专业方向与就业市场中受高等教育的文科人员的就业状况和社会进入¹密切相关。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科研力量的专业结构和研究关注、以及高校中科研教学活动的专业分布与社会实际需要之间存在差距。这些专业领域知识和训练的缺乏，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就业，并且会对各专业学生的社会进入能力产生重要影响。

从新疆知识界学术生产的专业结构数据中，我们也可以推测出，新疆的大学毕业培养的是以文科生为主的大学毕业生，而在社会进入能力方面的知识熏陶和专业训练方面，这些学生并没有受到很好的培养，指导他们的专业教师和可供他们阅读的专业出版物十分有限。因此，他们只能在法律服务、工商企业管理、社会文化服务和管理、大众传媒的营运和管理这些市场能够提供的容纳文科人力资源最多的职业领域以外寻找就业机会。而直接决定一个现代社会服务业水准的这些专业的学术生产能力的现状，也反映并决定了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特别缺少相应专业的人才，少数民族的社会管理和服务业的专门化水平、专业化能力都十分有限，进入全国性同业网络的可能性极低。这会在社会生活中使少数民族受教育人口有“被排斥”的心理感受。如果巨大的智力和心理能量不能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正常运行、发挥效能，必然会不断产生负面的释放压力。这是政府决策部门在估计和判断形势时不能忽视的一个结构性现实。这个问题可能不仅出现在新疆，其它自治区可能也存在类似的现象。而本项研究则揭示出了这样一种“问题产生链条”存在的可能性：现实的结构性的压力的一个重要源头，实际上蕴含在建国以来形成的学术体系和相应的研究、教育系统中。

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关注和学术热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形成新世纪头10年新疆社会文化面貌和人们的社会心态的基础。汉文的学术研究向经济领域集中，是一种“向钱看”和“向外看”的表现；民文的学术研究偏向语言文学和历史，体现的则是“向内看”和“向后看”的倾向。在人文社科领域学术研究的取向上看，汉语学界和民语学界不仅没有“并驾齐驱”，二者甚至是在“背道而驰”。这期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存在的缺陷与之后十年间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可以用马克思关于意识的反作用理论来理解。社会是一个高度互馈的复杂系统，

¹ 指人口从乡村到城市、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流动，也指人口从职业地位金字塔的低端向高端的流动，其中有突破社会网络限制、凭借自身能力进入职业地位高的专业群体及各种圈子的含义，也有各种社会群体或圈子乐于接纳新加入成员的含义（英文为 inclusion，与之相对的是 exclusion，社会排斥）。如我们常说的“进入娱乐圈”、“打入富豪俱乐部”等，讲的就是社会进入。当前我国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群体政治权力不平等方面，而在于社会环境中的障碍和少数民族个体的社会进入能力问题。现有的群体政治权力保障机制不能解决社会进入能力不足和社会环境的问题，通俗的说，有再多的省长和主席，也解决不了一个少数民族社会中没有科学家和大学者、没有大企业家和高级白领、没有高级律师和会计师、没有媒体大亨和大明星等等带来的问题。而由于人口规模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限制，只有走出本民族的小圈子，进入全国市场，才能培养和成长起来一批打入各行各业高层的少数民族人才，形成少数民族社会进入的良性循环。本项研究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我国少数民族在社会进入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障碍，这些障碍，或者说“社会排斥”，并不是政府和社会主观意愿上的，而是结构层面上的，是相关的制度设计忽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特征而产生的意外后果。前文注释中提到的统计信息中民族指标的缺失、信息服务中民文内容的缺失、少数民族信息获取能力的差异，还有这里讨论的教育中的专业结构偏差，都是社会学意义上典型的结构型社会排斥。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如不及时调整，将会波及到人们的主观判断和社会认同。结构性问题的影响，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话语表述和舆论引导，都很难避免，甚至会直接危及公共媒体及相应的政府机构的公信力和合法性。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有超过一代人的时间了，这种意外后果已经开始产生社会效应。普遍化的社会心态和有关我群和他群关系的意识形态共识一旦形成，就会出现自我复制、自我合理化和合法化以及自我放大的过程，这种意识形态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结构基础如果不改变，社会必然会被导入民族主义和独立建国的轨道而难以逆转。因此，进行有效调整的时间窗口会随着代际更替而关闭！

每一领域的问题可能影响整个社会系统的演化。如果说信息系统是这种互馈中最核心的系统，那么，知识生产又是信息系统的核心。历史学关涉对过去的界定和记忆，决定人们的社会认同，也是人们塑造社会认同的工具；文学作品时时反馈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达、界定和塑造着情感模式和社会心态。整整十年对这两个重要领域的忽视，足以影响一代人的历史观和心理情感。新疆社会在这方面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由于体制内我国各地都具有极高的同质性，可以想见，这个问题也不独新疆才有。这一点提示我们，应当对各语种、各学科、各重要专业方向的发展状况、学术生态及其可能产生的现实社会影响做全面评估。

表4和表5也反映了新疆当地研究中对新疆本地的关注程度及其分布。在我们统计的论文的题目中，只要出现新疆的地名、人名、族名、语种或发生在新疆的事件等等的，我们都归入“新疆研究”统计。在关键词的学科归类频次统计中，新疆当地的学术研究中关注新疆本地的比例占不到一半。最关注新疆本地专题的依次是考古学、中国文学、人文和经济地理学，新疆研究占本专业成果统计频次的90%以上。超过50%的是历史学、语言学、教育学、环境科学和社会学。但是，除了历史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之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所占比例都非常低。也就是说，在新疆当地的学术统计中，关注新疆的专业方向主要分布在研究成果较少的一些专业。这是一个地区的学术对本地区的关注状况。这种状况可能在一个侧面反映出，对于那些只有新疆当地才会有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在经济活动、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和表现，即使新疆当地学界，也没有做到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

在没有出现与新疆有关的关键词的研究成果中，有极小一部分研究我国其他省区的民族志以及中亚各国国际关系问题，其他成果都没有“在地性”（locality）或标为“我国”、“全国”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国家政策和党史的宣传、解读。

通过这种对研究成果关键词的地域分布的简单分类统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新疆当地的学术研究映射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世界图景：关注国家（中国）的一些面向——主要是政治、经济 and 法律的——属于社会的权利和资源分配范畴；关注新疆的是一些用汉、维吾尔和哈萨克文叙述的片段；以及零零碎碎的对其他地方的一点关注。学术成果呈现的这样一种世界图景，并不能等同于知识界的世界图景，更不能等同于经由大众媒体传播的社会的知识世界图景。但这种现象认知策略有助于帮助我们接近人们头脑中的世界。要更全面准确地了解这个世界，需要对大众媒体和网络世界的信息传播做详细的内容分析。这有点类似于人体的营养状况检查，目的在于消化和排泄多余的、僵死的，补充不足和缺失的，以维持机体健康运行。当然，从来不做这项检查的人照样能够存活，只是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存在的风险没有知觉而已。

三、在京中央所属机构的新疆研究

在我国，由中央各部门主办的研究机构，基本上都是各研究领域发展时间最长、各种资源最密集、学术水准最高的权威性机构。这些机构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出发，研究全国范围的相关议题，学术视野也较为开阔。作为国家各研究领域的领头羊，中央所属研究机构也负有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统领学术大局，为国家建设服务的责任。这些研究机构对新疆的关注程度和相关研究的状况，是我们了解我国知识生产的中央层面对新疆的认识和重视程度的重要窗口。

（一）现状

在我们选取的70种期刊中，在京中央所属机构主办的有25种，涵盖民族研究、文学、语言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考古学、社会科学、宗教学和教育学9个学科（详见表6）。

理论上讲，对新疆这样一个国土面积占六分之一，具有丰富多样性且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一个专业都会发现，那里有许多值得专门加以关注和深入研究的

议题。考虑到各种刊物的专业性程度不同, 办刊对象和宗旨不同, 无法规定出一个标准来衡量各种刊物对新疆研究的关注程度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首先来看全国性民族研究类学术刊物的新疆研究状况。统计相对完善和规范的《民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和《民族教育研究》3种期刊, 所发表的新疆研究论文占该刊发文总数的比例分别是7.09%、7.81%和4.31%。如果用发表文章总数来比较, 《民族文学研究》的新疆研究发文数的比例也在7%左右。这4种在京民族类学术期刊中, 《民族教育研究》比例偏低, 其他3种都在7%左右。

表 6. 在京中央锁住机构主办的部分学术期刊的新疆研究状况

刊 名	统计时间	统计期数	统计文章总篇数	涉及新疆研究篇数	占总篇数%	备 注
民族研究	1979-2009	182	2243	159	7.09	
世界民族*	1979-2009			42		
民族文学研究	1983-2010**	63	1439	132	9.17	只统计了有相关文章的刊期
中国语文*	1994-2010			1		新疆回族
民族语文*	1979-2010			72		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办
语言文字应用*	1992-2010			7		《语言文字报》社办
政治学研究	2009-2010	7	121	0	0	
中共党史研究	2009-2010	17	203	0	0	
中国法学	1986-2010		1977	0	0	有 10 篇有关少数民族的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	180-2009		2915	3	0.10	缺 2007 年
中国宗教	1995-2010	125	4040	9	0.22	
考古学报	1953-2008	175	943	14	1.48	
考古	1959-2008	495		61		
中国历史文物	1979-2008	180		3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1-2009	72	1200	225	18.75	
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4-2009	93	1771	2	0.11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4-2009	38	289	39	13.49	
近代史研究	1979-2009	174	2920	13	0.45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1965-2010	437	7305	33	0.45	
教育研究*	1979-2010			1		与民族教育相关 7 篇。中央教育研究所办
课程教材教法*	1981-2010			1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育研究所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1995-2010	91	2317	181	7.81	
民族教育研究	1989-2010	117	1369	59	4.31	中央民族大学办
清史研究	1991-2009	76	1220	18	1.48	中国人民大学办
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	1985-2009		2020	3	0.15	

* 统计数据缺失严重, 为无效统计。但其统计的新疆研究篇数数据可用。

** 2010 年统计截止时间为 5 月。

其次, 新疆研究在其总发文数量中占比例最高的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为 18.75%。除民族类期刊之外, 新疆研究在发文总数中所占比例超过 0.3%的刊物有 4 种, 其中, 历史考古类 3 种, 教育类 1 种。

新疆是一个伊斯兰教人口比例较高的省份, 宗教对现实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具有重大影响, 是我国宗教研究和宗教事务管理领域关注的重点地区之一。由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主办的《中国宗教》, 新疆研究只占其发文数的 0.22% (详见附件 9), 不到民族类期刊这一比例的 3%! 可以换句话说, 《中国宗教》对新疆问题的关注度只有民族类学术期刊的 3%。为核实这一统计结果, 笔者抽检了该刊 2012 年已出版的 4 期和 1995 年以来每年的任意一期共 21 期, 只有两篇新疆方面的文章。在这 21 期中, 汉传佛教和基督教方面的文章占大多数, 且近年来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 而信教人口以少数民族为主的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方面的文章比例不大, 且越到近期比例越低。虽然收入了 CSSCI 目录, 但《中国宗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期刊, 所以, 该刊发文的内容结构更能说明当前我国宗教研究领域的状况。普及性读物的状况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知识生产的结果和传播的现状, 而知识生产和传播又是学术和教育发展状况的结果。《中国宗教》杂志的这

种状况,只是我国宗教研究方面的结构现实的一个表象。在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混杂的当代世界,研究民族问题而不关注宗教问题,或者反过来,研究宗教问题却不关注民族问题,都无法很好地把握住问题脉动。

而在法学、党史研究和政治学三类的不完全统计中,新疆研究的论文发表为零。《中国社会科学》勉强达到0.1%——只能说它仅仅是突破了“零”的记录。我们可以说,在抽选到的法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在京权威学术期刊中,对新疆研究的关注度不到民族类学术刊物的1%。与零记录相比,《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对新疆研究的关注度显得难能可贵了。这就是我们通过内容调查得知的在京中央所属机构社会科学领域的新疆研究现状。

由于研究对象为边疆地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可以归入民族研究类学术刊物。在我们所统计的这些在京中央所属机构主办的学术刊物中,对新疆研究的关注程度也呈现出民族类与非民族类的巨大差异。这与新疆当地的新疆研究的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的结构特征类似,也是一种民族研究与非民族研究的二元结构:民族类学术刊物比较关注新疆研究,而相比之下,非民族类学术刊物对新疆研究的关注度极低。同时,从专业结构上看,文史类学术刊物中关注新疆研究的文章比例高,社科类学术刊物的关注度非常低。

在京中央所属机构主办的学术刊物中新疆研究的这种状况没有达到对其进行更细致的分类别分专业内容分析研究的基本条件——非民族类学术刊物所发表的研究成果的数量太少,对其进行内容分析没有统计意义,也就无法做比较研究¹。

如果,位居“中央”的全国性的研究机构对新疆这个具体的地方的研究状况不是孤例,那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由专门研究“全国”的研究构成的“全国”图景:一个呈现着各种学科所描述的性质的一块囫圇国土上笼统的整体。这是一个只有简单构造的类似于水母的有机体,根本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在人口、自然空间以及社会世界中都已经深度分化了的复杂系统。用如此简单的一种认知构造去认识我们这样一个巨型的复杂社会,犹如一个成熟的巨人的肩上长着一个婴儿的脑袋。

(二) 专项新疆研究

随着三股势力的出现和新疆社会经济问题的凸显,中央各部门都加强了对新疆的调查研究。例如,2005年和2006年,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曾组织由北京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自治区民宗委和本中心研究人员共同参与的《新疆专题研究》,对影响新疆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多个层面的问题做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这个项目的突出特点是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研究敏感问题,研究成果对相关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但由于涉及敏感问题,课题成果多数没有公开发表。这是由相关部门投入开展的新疆研究的普遍状况。即有大量对新疆的现实问题的研究不作为学术研究成果公开发表或出版,对学术界以及社会的影响相当有限。由于各部门都会借助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研究力量组织专项研究,这种形式的研究在我国的学术生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以公开发表或出版的学术成果为媒介考察新疆研究状况的内容分析无法将这一部分研究包含在内。

不同的是,教育部和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项目都可以在网上查到相关信息,其资助成果一般

¹ 考虑到进行专门研究的学术期刊越具有随机性,也就越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在做课题设计时笔者允许参与课题研究的同学们根据个人兴趣和自己对于重要性的判断来选择期刊,而没有预先设定选刊标准。在本项课题完成的16个分项研究报告中(见附件1-16),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可以做得较为详细,多数都只能做概述,而无法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原因就是与新疆相关的可统计对象实在太少,无法形成有效的分析数据。这种情况在各地地方主办的学术期刊中也一样存在。笔者在做相关统计时也不得不根据统计数据的可利用程度不断放弃前功、调整路径,深切体会到大家在做这项研究时所遭遇的难题、困惑和焦虑。对于年纪只有20多岁、还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学习和研究的主攻方向不是民族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理论和方法与本项目距离较远的同学们来说,实在勉为其难,能够做到现有程度已是难能可贵。在此,笔者向他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也都要求公开发表或出版。考虑到国家社科基金对我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巨大影响力，我们检索了全国社科规划办公布的 2008-2012 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详见表 7）。

国家社科基金对新疆研究的资助主要集中在西部项目和年度项目的民族问题研究类中。在这两类项目中，新疆项目都占 10% 左右，应该说比例不低。在全部项目中，新疆研究项目占 3.23%，只有西部项目和年度项目的民族问题研究类的三分之一。这说明，新疆研究在地域范围和专业结构上都比较集中。关注新疆研究的以新疆学术机构为主，其次是北京的相关中央所属机构的研究单位，然后是西北地区陕甘宁青四省区。这个范围之外的新疆研究，只检索到一项考古学项目。我们可以据此说，在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分布上看，还是民族地区和民族系统关注民族地区，而那些研究力量相对较强、科研人力资源更加丰富、专业分布更加均衡的学术机构则很少投入力量关注新疆研究——依然表现出“二元结构”。

表 7. 2008—2012 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新疆研究所占比例

年度	项目名称	立项数	新疆研究项目*数	新疆研究项目所占%
2012	西部项目	540	45	8.33
2012	第一批重大项目（文化类）	35	0	0.00
2011	后期资助项目	295	1	0.34
2011	后期资助项目（第三批）	165	1	0.61
2011	重大项目（第三批）	36	0	0.00
2011	重大项目（第二批）	89	4	4.49
2011	重大项目（第一批）	63	1	1.59
2011	后期资助项目（第二批）	15	0	0.00
2011	艺术学项目	142	6	4.23
2011	教育学项目	167	0	0.00
2011	后期资助项目（第一批）	115	2	1.74
2011	西部项目	483	40	8.28
2011	年度资助项目	2883	44	1.53
	其中：民族问题研究	120	13	10.83
2010	年度资助项目	2285	37	1.62
	其中：民族问题研究	88	7	7.95
2010	重大招标项目	54	0	0.00
2010	重大招标项目	81	4	4.94
2010	后期资助项目	223	2	0.90
2010	西部项目	402	45	11.19
2009	西部项目	346	37	10.69
2009	重大招标项目	71	2	2.82
2008	年度资助项目	1691	35	2.07
	其中：民族问题研究	62	8	12.90
2008	后期资助项目	27	0	0.00
2008	西部项目	294	33	11.22
合计		10502	339	3.23

* 指直接与新疆研究相关或由新疆学者申请的课题项目。

资料来源：<http://www.npopss-cn.gov.cn/GB/219534/index.html>。

在检索中，我们发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支持民族研究的专项项目（如西部项目）的专业结构，与每年的年度项目中“民族问题研究”类的专业分布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并且，在年度项目中民族研究少或者不做民族研究的专业，民族问题研究类项目和专项项目中同样不多或者没有。即在民族问题研究类项目中，占比例最大的还是“民族问题研究”¹。这种专业分布的高度

¹ 与教育部的学科划分不同的是，社科基金项目没有“民族学”这个大学科，而设有“民族问题研究”来专门处理相当于教育部学科分类中“民族学”的内容。这种学科设置在内容统计上存在的问题，前文已有讨论。对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反映出，作为一个与所有学科交叉的专门领域，交叉的结果不是促进各专业对民族问题的研究，而是使民族问题研究在既有的结构框架内越来越陷于内部循环。这是另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集中，实际上说明，民族问题研究没有被纳入各个专业中，而是放在了“民族问题”中研究。这反映出我国民族研究专业分布的偏差，新疆研究当然也无法例外。这也说明，在新疆当地的学术研究中表现出来的专业结构偏差，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西部项目是年度项目中民族问题研究类项目的重复设置，这个项目的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加大了民族问题研究项目的数量，而对改变民族问题研究的专业结构，则作用不大，并且实际上还会放大现有结构特征。这个问题可以转译为：在我国，主要由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研究机构在相当集中的专业方向（民族研究）上研究民族问题。这是一个典型的内部循环。知识生产的内部循环会产生什么样的知识状况，凭借常识就可以判断出来。而在特定的关于“民族”的意识启蒙和社会动员话语中，知识生产的内部循环的严重后果，也是一个不难理解的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都存在这个问题，这说明我们所看到的新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认识、制度和管理问题。

从新疆研究在民族研究项目中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出，新疆研究受到了高度重视。为弥补本课题不能全面检索近年来国内的学术成果，从而无法判断这些项目的实际产出这一缺陷，我们选取了一个项目，作为案例，来看项目资助的效果。

我国有史以来在新疆研究方面投入最大的项目是《新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项目。

《新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项目（简称《新疆项目》），是2004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正式批准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项目为期5年，经费为每年600万元人民币。

“新疆历史与现状研究”也是一个总的课题框架，其中又设立了约80项子项目。

同《东北工程》一样，《新疆项目》子项目也分为6大类：

第一类子课题是基础研究类，约有60多项，最终形成研究专著。

第二类子课题是档案文献类，重点放在档案上。投入最多的档案类子课题是《满文边疆档案》新疆部分的整理，约6万余件，预计2010年底开始影印出版。另外一项较大的档案类子课题是《清代新疆档案选辑》，收录清代以吐鲁番厅为主的新疆档案，约6万余件，预计2011年进入出版。

第三类子课题是翻译类。选编并翻译了一批国外关于新疆的著作，主要是英文、俄文，有些可能供内部研究使用，不作公开出版。

第四类子课题是数据信息库建设。投入了一定的资金和精力对新疆的历史研究数据信息做了汇总。

第五类子课题是要编写部分普及读物。

第六类子课题是当代中国边疆典型百村调查。第一批出版 20 种。2010 年 7 月出版，

明年 7 月出齐。¹

这个项目的具体执行单位是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所。该所正是前文分析的刊发新疆研究成果比例最高的中央所属机构学术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主办单位。我们对该刊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该刊历年来发文数量的变化、专业结构以及作者结构等方面的特点，可以作为观察这个项目执行状况的一个侧面（详见附件 12）。

四、全国其他地区的新疆研究

我们抽选的 33 种新疆以外各地主办的学术期刊，分布在北京、上海、吉林、内蒙古、河南、山东、陕西、甘肃、江西、广东、湖南、湖北、广西、四川、云南等 15 个省、市、自治区，涵盖文化研究、政治学、法学、教育学、考古学、历史学、人文和经济地理学、艺术学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综合类（详见表 8）。

从发文的篇数来看，历史和地理方向相对更重视新疆研究。在能够计算发文中新疆研究比例的刊物中，新疆研究比例最高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也不到 3%。其他专业方向的学术刊物对新疆的关注甚至谈不上不高。

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广东省的《开放时代》并没有向新疆开放。开放的方向，只是向国外开放，没有向国内开放；开放的面向，是信息和经济开放，而不是文化和心态开放。

即使相邻的陕西和甘肃，也没有表现出对新疆这个邻居的更多关注。

如果说北京作为学术中心主要代表了中央所属机构的状况，而上海则代表了我国地方性学术中心的状况。新疆在上海的学术空间里，寥若晨星。

表 8. 部分地方性学术期刊的新疆研究状况

刊名	统计时间	统计期数	统计文章总篇数	涉及新疆研究篇数	占总篇数%	备注
民俗研究	1985-2010	96	2800	4	0.01	估计。山东办
求实	2000-2007		2398	0	0	江西办
政治与法律	1984-2010		3402	0	0	有 4 篇涉及西部和少数民族的文章，上海办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0-2007 2009-2010	55		0	0	吉林大学办
教育发展研究*	1981-2010			1		上海。共有 7 篇西部教育
电化教育研究*	1994-2010			1		兰州
考古与文物	1980-2008	170		25		陕西办
文物	1950-2008	631		52		北京办
敦煌研究	1983-2008	112		18		甘肃
华夏考古	1987-2008	82		2		河南办
地域研究与开发	1982-2010	28	665	25		河南办
人文地理*	1997-2008			14		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研究所、西安外国语学院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
经济地理*	1982-2009			30		中国地理学会、湖南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85-2009	92	1847	55	2.98	陕西
旅游学刊*	1986-2009			1		北京联合大学

¹ 《近八年中国边疆研究学科的重大项目》作者：厉声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见 http://www.tibetology.ac.c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798。

人文杂志	1957-2009		4943	4	0.08	陕西
社会科学研究	1979-2009		4707	3	0.06	四川
社会科学战线	1978-2009		8088	4	0.05	吉林
社会科学	1993-2009		4305	1	0.00	1979年创刊, 1993年以前缺。上海办
学术月刊	1957-2009		7220	0	0	缺1967-1978年。上海办
文史哲	1953-2009		4815	1	0.02	山东办
开放时代	1989-2009		1600	0	0	广东
北京社会科学	1986-2009		2275	0	0	完全统计
民族艺术研究	1988-2010	126		2	> 0.01	估计。云南办。次刊以下为民族类学术期刊
民族艺术	1985-2010	96	2500	19	0.76	估计。广西办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1996-2009	179	11326	7	0.06	成都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1995-2009	88	4232	38	0.90	武汉
汉语学习*	1980-2010			3		延边大学办
云南社会科学	1981-2009		3035	1	0.03	完全统计
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	1980-2010			1		新疆察哈尔蒙古
内蒙古大学学报 (文科版)*	1959-2010			1		新疆蒙古族学生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文科版)*	1958-2010			2		巴州地区农村劳动力; 清代新疆地区蒙古官学
广西民族研究	1995-2009	102	4816	14	0.29	

* 统计数据缺失严重, 为无效统计。但其统计的新疆研究篇数数据可用。

** 2010年统计截止时间为5月。

让我们感到意外的统计结果是, 即使是其他民族地区的学术刊物或地方性民族研究类学术刊物, 也都不重视新疆研究, 比例最高的也不到1%; 同样是重要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内蒙古的3种学术期刊总计发了4篇与新疆研究有关的文章, 且都是关注新疆蒙古族的。这是不是反映出一种大家都只研究本地区、本民族的思维倾向?

如果研究的视野都没有超越出本地区、本民族的范围, 怎么可能做到心怀全国、放眼世界和重视历史、着眼现实、把握未来?

与在京中央所属机构的研究状况一样, 这样的新疆研究从发文数量来看, 即无法进行更深的分析——因为达不到进行统计分析的样本总量要求, 其他也就无从谈起了。

由于特殊的需要, 我们在这里关注了各地的新疆研究。地方性学术刊物的这种新疆研究状况, 可能反映出以下问题:

1. 区域间的知识交流、相互解读、彼此借用以及比较研究不活跃。
2. 可能全国范围内都存在各地区各自孤立地进行学术知识建构的问题。

很难想象, 各地对其他地方的研究会与他们对新疆的研究有质的不同。比如, 上海可能不会更重视对山东、西藏或者吉林等地的研究而唯独忽视对新疆的研究。所有的省区都没有动力投入学术资源去关注中央和他们当地以外的其他地区。基于全国各地的学术体制是一样的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可以把新疆的学术生产中的地方性知识生产和一般性知识生产的结构作为一个例子, 以此来认识全国各地的学术生产, 各地的学术生产可能都存在着类似于新疆的那样一种“知识的世界图景”。局部化、狭隘化的地方性学术, 不可能在比较视野中对自我和他者做出关系性的、历史性的理解。知识生产的状况是如此, 我们到何处去寻求一个人口正在加速流动的社会所需要的理解和处理多元文化关系的知识和能力?

一方面, “中央”的学术在生产一个没有各地存在的抽象化的一个整体, 或者说中央。各地又都在以自己为中心来解读和组合一个“全局”, 这种知识状态下的“顾全大局”依然是一个“小局”。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层面是, 由于“各地”被抽离出“中央”, 一些地方或一些具有特定背景的力量, 就可以借助话语运作的方式, 将自己装扮成“中央”, 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权力和关系格局。在这种格局中, 地理空间上的距离和文化上的差异就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工具和资源, 形成巨大的排斥力。问题并不是出在主观意愿方面, 而是出在结构层面, 在一个既有的结构框架中,

大家都意外地生产出了本来并不想要的甚至是一直在竭力避免的知识面貌。在这个意义上看，新的历史时期的国家整合面临新的任务，我们还任重道远。

五、结 论

上文我们对新疆研究状况所作的内容分析，可以简单地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我国的学术生产中存在明显的三种区隔：民族研究与非民族研究之间的学科区隔、各省区之间互不关注的地域区隔和少数民族文种与汉文之间的民族区隔。

第二，在学术生产中还明显存在三种冲突：专业结构与社会现实需要的冲突；学术管理目标与结构现实的冲突；全国整合的需要和知识生产中地方分散化、中央抽象化的冲突。

第三，这些区隔和冲突中的学术生产，可能会造成知识领域的三种匮乏：社会中普遍缺少理解、分析和判断族群关系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基础知识；我们的社会缺乏理解文化多样性和处理各族人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谐相处的社会生活基本知识；知识领域缺少对国家整合和凝聚纽带的强化。

第四，这样一种知识状况下，我们需要考虑到四种后果：人们的社会和文化理解力不足，严重影响政府行为、学术生产和公共舆论对多民族国家族群事务的重视、管理和引导能力；历史记忆和社会知识的地域区隔和民族区隔将严重影响全社会的国家想象和各族群的认同取向，有可能直接危及中华民族凝聚力；由于对以新疆为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术研究没有很好地回答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在国际知识生产的竞争中，我们正逐渐失去国内族群关系领域的话语权，为外部话语逐渐控制社会思维提供空间；我国的少数民族在既没有自己的现代社会知识生产能力，又缺乏国内有效的知识供给的情况下，可能会从外部寻找知识资源，用以理解本社会的历史和现实，重建或恢复话语能力，这种情况下，容易受到外部话语的左右甚至操纵。

知识生产中的二元结构是我国社会族群事务中的二元结构自我复制的要害，也是影响我国族群关系演变的关键要素之一，必须给予高度重视。需要从学术管理体制和人才培养方面入手，消除造成问题的结构条件，为形成良好的学术生态创造结构基础。

【论 文】

新疆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的语言能力、 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¹

孟红莉²

摘要：运用 PPS 抽样方法，我们以结构式访问法在新疆伊宁市城市居民当中进行了有关语言能力、语言使用、语言态度的调查。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普遍具有维汉双语能力，但高比例的双语人口和较低水平的汉语使用能力同时并存；维吾尔语与家庭、友谊、学校等领域相连，维汉

¹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疆城市居民的语言使用与族群关系”（项目编号：07CSH012）的阶段研究成果。

² 作者为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

双语使用模式与日常生活、工作领域相连，场合越正式，汉语使用比例越高；在语言态度上他们既注重语言的实用效用，也强调语言和语言学习的象征意义，对学校族群结构和学校教学语言类型的期待是多样化的。语言是认识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尤其是在多族群共同居住的地区，本文还就调查数据所反映出来的学校教育、各族群之间交往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伊宁市 维吾尔族 语言能力 语言使用 语言态度

伊宁市位于新疆西部，地处中国西北边陲，是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首府城市和伊犁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居于伊犁河谷中部，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为东西陆路交通的要冲，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边境城市，也是我国西北最大的沿边开放城市。

伊宁市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地区，尤其是其中的维吾尔族人占到了总人口的一半左右。2010年末伊宁市总人口是471,462人，其中维吾尔族232,998人，汉族164,576人，回族35,009人，哈萨克族21,384人，其他民族总计17,414人。¹从各族群所占的比例来看，维吾尔族占到了全市人口的49%，回族占全市总人口的7%，哈萨克族占5%，而汉族则占35%，其他锡伯族、蒙古族、满族等族群所占比例都较低（1%以下）。这座城市长期以来是一个多族群共同居住的地方，到清代和民国时，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汉、满、回、锡伯、达斡尔、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等族群相继成为伊犁地区的世居族群。²

2009年底时，伊宁市共辖有8个街道办事处、8个乡、1个镇、1个场，总共包括有89个社区居委会、46个行政村。³此外，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也位于伊宁市内。⁴我们的研究关注的是新疆城市居民的语言使用情况，具体到本论文中就是居住在伊宁市的市区范围内的维吾尔族居民，再更具体就是伊宁市街道办和合作区所辖的、属于社区居委会的维吾尔族城市居民，不包括乡、镇、场等属于村委会的维吾尔族居民。

一、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的人口概况和居住特点

2010年末伊宁市各街道办总人口有28.67万人，其中维吾尔族人口有12.67万，占到了街道办总人口的44.2%；其他依次是汉族人口有11.62万，占40.5%；其他回族人口占到6.8%，哈萨克族人口占到4.1%（见表1）。如果从族群构成角度来看，维吾尔族人口显然在伊宁市区人口中所占比例最高，但汉族人口比例和维吾尔族人口比例相差不是很大。如果从所使用的语言的角度来看，使用汉语的汉族人和回族人的比例总计约有47.3%，与使用维吾尔语的维吾尔族人的比例相差也不大。

表1 2010年伊宁市各街道办总人口及各主要族群的人口情况

街道办	总人口	维吾尔族		汉族		回族		哈萨克族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萨依布依	59908	10373	17.3	41511	69.3	2373	4.0	2982	5.0
墩买里	28541	11134	39.0	11332	39.7	1771	6.2	2547	8.9

¹ 新疆伊宁市统计局、新疆伊宁市统计学会编，《伊宁市统计年鉴2011》，第69~70页。

² 赖洪波，“伊犁历代移民开发与世居民族的形成”，《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3月（第28卷第1期），第29页。

³ 伊宁市史志办编，《伊宁市年鉴2010》，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12，第36页。

⁴ 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位于伊宁市西郊，始建于1992年，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是沿边开放城市发展边境贸易和加工出口的区域。合作区国务院批准规划面积6.5平方公里，控制面积30平方公里。从1992年到2007年的15年间十五年间，其建成区面积由不足0.61平方公里发展到6平方公里，驻区企业发展到281家，有产值超亿元企业2家，超千万元企业11家。（见：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网站，<http://www.ynhzq.gov.cn/qy/gk/lsyg.jsp?urltype=tree.TreeTempUrl&wbtreeid=10>）随着合作区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居民不断入住。

艾兰木巴格	58069	22022	37.9	27553	47.4	4104	7.1	1822	3.1
琼库勒克	39005	25135	64.4	6666	17.1	5388	13.8	908	2.3
喀赞其	22664	14760	65.1	5504	24.3	1105	4.9	405	1.8
都来提巴格	24692	19382	78.5	1912	7.7	1740	7.0	324	1.3
伊犁河路	21970	14065	64.0	5209	23.7	1263	5.7	666	3.0
解放路	31860	9834	30.9	16521	51.9	1820	5.7	2013	6.3
街道办合计	286709	126705	44.2	116208	40.5	19564	6.8	11667	4.1

注：数据见《伊宁市统计年鉴 2011》73 页。

从表 1 中还可以看到，都来提巴格街道办、喀赞其街道办、琼库勒克街道办、伊犁河路街道办中的维吾尔族居民比例较高，60% 以上的居民是维吾尔族，其中都来提巴格街道办总人口中有 78.5% 的是维吾尔族。这几个街道办当中的一些街巷，例如工人街、黎光街、果园街等，传统上就是维吾尔族的聚居区，现在也仍然保持着这种特色，其中一些社区的维吾尔族人口是在 95% 以上，甚至全部都是维吾尔族居民。汉族人口居住相对集中的街道办有萨依布依街道办、艾兰木巴格街道办、解放路街道办，其汉族人口占本街道办总人口的比例分别是 69.3%、47.4%、51.9%。

我们再从社区层面来深入分析一下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的居住特点。我们先将伊宁市的社区划分为三类：少数民族比例占三分之二以上的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比例少于三分之一的社区是汉族聚居区，介于二者之间的为混居区，然后把各个街道的社区归到这三种类型当中。2010 年时伊宁市各街道办的社区具体情况见表 2。

表 2 2010 年伊宁市各街道办、合作区的人口和社区情况

	总人数	少数民族人口		汉族人口		社区类型 (个数)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少数民族聚居	民汉混居	汉族聚居
萨依布依街道办	59219	12231	20.7	46988	79.3	0	3	9
墩买里街道办	20897	11189	53.5	9708	46.5	2	3	2
艾兰木巴格街道办	55209	22761	41.2	32448	58.8	1	9	5
琼库勒克街道办	36725	32537	88.6	4188	11.4	12	2	0
喀赞其街道办	25855	18946	73.3	6909	26.7	6	0	2
都来提巴格街道办	25152	24099	95.8	1053	4.2	9	0	0
伊犁河路街道办	23599	15890	67.3	7669	32.5	3	3	0
解放路街道办	30469	12777	41.9	17692	58.1	2	4	4
伊宁经济合作区	37755	4952	13.1	32803	86.9	0	1	4
合计	314880	155382	49.3	159458	50.6	35	25	26

注：本表格中的数据由伊宁市有关部门提供，其中的有些数据和统计年鉴中的相应数据有一定出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时间上的差异，本表格的数据是 2010 年初左右的数据，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是 2010 年末的数据；二是报送部门不同，统计口径也不完全一致。

通过对伊宁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分析，我们认为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的居住特点是：在大分散格局中形成了以街道办为范围的较大聚居区。具体来讲，首先，在全市各街道的几乎所有社区当中都居住有维吾尔族人，这形成了大分散的特点；其次，维吾尔族的聚居区范围都比较大，其中喀赞其街道办、都来提巴格街道办、琼库勒克街道办都是维吾尔族的聚居区，它们分别位于伊宁市的南部、东南部、东部，连成了一个更大的维吾尔族居住片区。从表 2 中可以看到，在伊宁市所有的社区中，少数民族聚居的这种类型最多。都来提巴格街道办的 9 个社区全部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而且少数民族所占的比例几乎都在 90% 以上，这些聚居区全部是维吾尔族聚居区。这样一个以整个街道办为范围的聚居区可以说是一个大范围的聚居，而不是一个小聚居区了。喀赞其街道办有少数民族聚居的社区 6 个，也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可以连接成片，同样是一个较大的聚居区。伊犁河路街道办有 3 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社区、3 个民汉混居的社区。琼库勒克街道办有 12 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社区，除了其中一些社区的回族居民相对较多之外，其他大多数社区还是维吾尔族比例较高的社区。

伊宁市汉族市民主要居住在以社区为单位的聚居区和民汉混居区中，但也有较大范围的聚居区，例如萨依布依街道办、合作区。回族市民主要是一种大分散的居住格局，除了在琼库勒克街道办有个别的聚居区外，基本上分散在伊宁市的各个社区当中。哈萨克族市民也是一种大分散的居住格局，没有比较明显的聚居区。如果从伊宁市市区的整体情况来看，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维吾尔族主要是居住在城市的东部、东南部以及南部地区，汉族主要是居住在西部、西北部以及北部地区。

二、调查方法及维吾尔族样本的构成情况

在伊宁市的调查中，我们的研究总体是伊宁市的常住城市居民，就是居住在伊宁市的所有社区居委会当中的城市居民。2010年时伊宁市总共有89个社区居委会，其具体分布情况是：各街道办总共有81个、合作区有5个、巴彦岱镇有1个、达达木图乡有1个、潘津乡有1个，这89个社区居委会中的常住居民就是我们的研究总体。在实际抽取要调查的社区样本时，我们依据的是伊宁市有关部门所提供社区层面的资料。这份资料包括88个社区，没有包括潘津乡的皮里其煤矿区这个社区，因该社区距离伊宁市区较远，由当地自行管理。这样，我们的调查总体实际上是：除了皮里其煤矿区之外的伊宁市其他88个社区居民委员会所管辖的常住居民。

根据伊宁市城市居民的族群结构特点，我们选择的抽样方法是PPS抽样（概率与规模成比例的抽样）。如前所述，我们依据族群构成将社区的类型划分为汉族聚居、民汉混居、少数民族聚居三种类型。进入调查总体的88个社区当中有汉族聚居型社区27个，常住人口137,148人；民汉混居型社区26个，常住人口93,504人；少数民族聚居型社区35个，常住人口95,520人。比较之后发现，伊宁市这三种类型的社区在数量上、常住人口数上没有非常大的差别，因此在抽样时没有分层，而是直接进行PPS抽样。具体抽样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抽取社区，先将88个社区按照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由小到大排序，运用系统抽样方法从中抽取13个社区；抽取中的社区有汉族聚集型社区5个、民汉混居型社区4个、少数民族聚居型社区4个，它们分属于伊宁市的8个街道办和合作区，在伊宁市的分布非常分散，能够比较好地代表伊宁市城市居民的整体状况。第二步抽取居民，到这13个社区中搜集所有常住居民的资料建立起抽样框，运用系统抽样方法在每个社区抽取65名16岁以上的人进行调查；再考虑到人户分离、调查对象不在家、调查对象不能回答问题等因素，在抽取够了规定的样本量之后继续按照原间距抽取若干样本，作为后备调查样本。

对于资料收集的具体方法，我们运用的是结构式访问法，由访问员按照统一的问卷向调查对象询问，然后由访问员来填写并回收问卷。在实施调查的过程中，一个基本原则是调查员的族群身份和调查对象的族群身份要匹配一致：汉族调查员主要负责调查汉族居民，维吾尔族调查员负责调查维吾尔族居民，哈萨克族调查员负责调查哈萨克族居民；并且，要求在调查过程中使用的语言是调查对象的母语，如果调查对象的母语使用得不是很熟练，才能用调查对象最熟练的语言进行调查。

我们于2011年1月和3月完成了对伊宁市沙依买里社区、胡木旦买里社区等13个社区的调查。调查结束后总共回收有效问卷804份，其中维吾尔族问卷348份，汉族问卷347份，回族问卷53份，哈萨克族问卷66份。由于我们采用的是严格的概率抽样并较为规范地控制了调查的各环节，因此能够用这些样本的情况来推论伊宁市城市居民的语言使用情况。

维吾尔族问卷总共回收的是348份，下面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方面分析一下伊宁市维吾尔族样本的构成情况（见表3）。从性别构成看，男性占了样本总数的54.4%，女性占了45.6%，男性略多于女性。从年龄构成看，30至44岁的青壮年最多（45.4%），45-59岁的中年人

的比例次之（27.9%），老年人的比例最低（9.2%），所有样本的平均年龄是41岁。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的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及初中以下，这部分人占了53.1%，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有24.5%，具有大学专科和本科学历的人有17%。从职业构成来看，维吾尔族居民的职业涉及到了各行各业，其中家庭妇女、个体户、打零工的比例略高一些。

表3 伊宁市维吾尔族调查样本的构成情况（百分比）

性别	男	54.4	职业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层、高层干部	1.4
	女	45.6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干部、一般工作人员	7.0
年龄	16—29岁	17.5	工业、建筑业企业中的的管理人员	0	
	30—44岁	45.4	工业、建筑业企业中的普通职工	2.0	
	45—59岁	27.9	商业服务业当中的管理者	0.6	
	60岁以上	9.2	商业服务业当中的普通职工	7.0	
			个体户	16.5	
文化程度	未受过正规教育	4.6	私营企业主	0.3	
	小学	18.2	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律师、医生、工程师等）	4.9	
	初中	30.3	离休、退休人员	7.8	
	高中	24.5	学生	4.1	
	职高、技校、中专	5.5	出租车司机	1.2	
	大专	10.7	下岗、失业、待业	8.4	
	本科	6.3	打零工、家政、摆摊	11.9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0	手工艺者	3.2	
		家庭妇女	17.4		
		其他	6.4		

三、语言能力

在伊宁市这样一个维吾尔族人口略多于汉族人口的城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的语言能力是怎样的呢？调查数据显示，伊宁市的维吾尔族城市居民普遍地掌握了维汉双语，99.7%的人会说维吾尔语，88.8%的人会说汉语，此外还有38.5%的人会说哈萨克语，有5.5%的人会说英语，4%的人会说俄语（具体见表4）。

1、对各种语言的具体掌握程度

对于本族群语维吾尔语，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当中有99.7%的人能够熟练地交流，87.6%的人能够熟练地阅读，76.1%的人能够熟练地写作。在调查样本中，只有一位维吾尔族居民完全不会使用维吾尔语并转用了汉语，这是一位36岁的女教师，她的父亲是维吾尔族，母亲是回族，丈夫是维吾尔族，她从小学到大学都一直就读于汉族学校。

对于汉语，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绝大多数都可以用汉语进行简单的对话交流，具体来说：80.4%的人都能够听懂简单对话，87.3%的人能够讲汉语的日常用语，74.9%的人能够用汉语进行简单的对话交流，但是能够熟练地用汉语进行各方面交流的只有25.9%。在读写能力上，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当中有27.1%的人能够用汉语阅读简单的文章，23.3%的人能够用汉语写一些简单的文章。

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有近四成的人会说哈萨克语，他们多数都能够运用哈萨克语进行口语交流，但是读写能力不强。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当中有23.7%的人基本上都能够听懂哈萨克语，有25.7%的人能够用哈萨克语进行简单的对话交流，能够阅读哈萨克语简单文章的有4.6%。

表4 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对维吾尔语、汉语、哈萨克语、英语的具体掌握程度（达到该语言能力程度的维吾尔族居民在维吾尔族调查总体中所占的比例）

	维吾尔语	汉语	哈萨克语	英语	
完全不懂	0.3	11.2	61.5	94.5	
听	能听懂简单的日常用语	99.7	88.8	38.5	5.5
	能听懂日常对话	99.7	80.4	33.8	3.7
	基本上都能听懂	99.7	40.1	23.7	1.4
说	会讲简单的日常用语	99.7	87.3	32.9	4.6
	能够进行简单的对话交流	99.7	74.9	25.7	3.5
	能深入进行思想交流	99.7	25.9	9.0	0.6
读	能看懂一些简单的字、词	92.5	42.7	6.6	4.0
	能看懂简单的文章	91.1	27.1	4.6	3.5
	能读懂所有的内容	87.6	15.3	1.4	1.2
写	能够写简单的字、词	89.1	37.5	3.2	3.7
	能写简单的文章	86.8	23.3	2.3	2.9
	能够熟练写作	76.1	13.0	0.6	1.2

对于英语，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会的人不多，能够用英语讲一些日常用语的人有4.6%，能够用英语进行简单交流的有3.5%。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当中还有4%的人会俄语，他们也多是能听懂俄语的简单日常会话。

2、各语言的习得途径

从表 5 中可以看到，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对维吾尔语的习得主要是在家庭和学校，这两项的选择都在 80% 以上；汉语的习得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其次是通过日常生活交流和工作，近半数的人选择了日常生活交流，三成多的人选择了工作中；哈萨克族语的习得主要途径是日常生活交流，绝大多数（70.9%）都选择了这一选项，也有两成多的人分别选择了朋友、工作中这两个选项。会英语的维吾尔族居民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其他还有个别的人是通过自学、看片等方式。

3、第一语言（最先学会的语言）

98.9%的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的第一语言都是维吾尔语，还有 0.6%的人的第一语言是汉语，0.6%的人是维吾尔语和汉语一起学会。在调查样本中，第一语言是汉语的频数是 2 人，其中一位就是前面提及的已经转用汉语的 36 岁的女教师；还有一位是 46 岁的男性，他小学时上的是汉族学校。小时候维吾尔语和汉语一起学的在样本中也是有 2 人，一位是 18 岁的学生，小学就开始上汉族学校；一位是 51 岁的打零工的女性，她上的是民族学校，但是小时候周围的邻居基本上都是汉族。

表 5 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对维吾尔语、汉语、英语、哈萨克语的习得途径（%）
（可多选，但不超过三项）

	维吾尔语	汉语	哈萨克语	英语
家庭	94.5	3.3	3.9	0.0
学校	80.1	60.0	7.8	73.3
朋友	1.2	6.0	24.3	0.0
工作中	2.6	34.7	23.3	6.7
日常生活交流	9.8	46.0	70.9	6.7
其他	0.6	3.7	8.7	26.7
合计	188.8	153.7	113.3	138.8
有效样本数	347	309	134	19

注：百分比指的是会该种语言的维吾尔族人选择语言学习途径在会该语言的样本数中所占的比例。

4、最熟练的语言及其习得时间、习得方式

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中 96.6%的人最熟练的语言还是维吾尔语，2.3%的人最熟练的语言

是汉语，1.1%的人说自己的维吾尔语和汉语都一样熟练。在多语言共存的生活环境中，一个人最熟练的语言有时候并不是自己本族群的语言。最熟练语言的习得和固定受到家庭、邻居、学校、朋友、工作环境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有时候学校教育会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简单分析一下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最熟练的语言和小学教育阶段的学校类型及学校教学语言之间的交互关系。

表 6 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的最熟练语言与小学期间的学校类型、学校授课语言类型的交互分类表（样本频数）

		最熟练的语言		
		维吾尔	汉语	维汉双语
学校类型	民族学校	300	0	0
	汉族学校	12	8	4
	民汉合校，但是民族同学和汉族同学是分班的	6	-	-
	民汉合校，民族班同学和汉族同学没有分班	1	-	-
学校教学语言类型	所有课程都用维吾尔语上课，没有开设汉语课程	115	0	0
	所有课都用维吾尔语上课，开设了一门汉语课程	181	0	0
	部分课程用维吾尔语上，部分课程用汉语上，还开有汉语课	3	0	0
	所有课都用汉语上课，开设了一门维吾尔语	2	0	0
	所有课程都用汉语上课，没有开设维吾尔语	14	8	4
	其他	3	-	-

从表 6 中可以看出，8 个汉语最熟练的维吾尔族居民全部都是从小学直接上汉族学校，接受的是全部用汉语授课的教学。维吾尔语和汉语都是最熟练语言的 4 个人全部上的也都是汉族学校。继续分析发现，汉语最熟练的这些维吾尔族居民在初中、高中、大学阶段绝大多数都仍然是在汉族学校就读。

最熟练的语言一般多是在幼儿时期和儿童时期学会的，伊宁市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出了这个特点。从表 7 中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维吾尔族居民都选择了在幼儿时期和儿童时期学会了最熟练的语言。汉语最熟练、维汉双语一样熟练的人也都是主要在这两个时期学会了最熟练的语言。选择在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才学会了最熟练语言的人很少。再看伊宁市维吾尔族居民最熟练语言的习得方式，家庭和学校也始终是最熟练语言的主要习得场所。一般情况下，最熟练的语言多数都是自己的母语，所以家庭是最主要的习得场所。对于汉语是最熟练语言的维吾尔族居民来讲，学校教育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

表 7 伊宁市维吾尔族居民最熟练语言的习得时间和习得方式的频数分布（可多选）

		最熟练的语言		
		维吾尔	汉语	维汉双语
习得时间	幼儿时期（7岁以前）	322	4	4
	儿童时期（7-12岁）	55	5	0
	少年时期（13-16岁）	30	2	0
	青年时期（17-35岁）	3	0	1
	中年时期（36-60岁）	2	0	0
习得方式	家人的影响	292	1	2
	周围同学和朋友的影响	36	1	3
	邻居的影响	7	0	0
	上学时，学校教的	176	7	3
	工作需要	7	0	0
	同事的影响	0	0	0
	自己觉得很需要	16	0	1
我喜欢这种语言	13	0	0	

其他	0	0	0
----	---	---	---

5、第二熟练的语言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本调查中所定义的第二熟练的语言指的是一个人能够听懂和运用这种语言应对日常生活的交流即可，并不一定要像最熟练的语言那样流利地交谈和深入地思想交流，也不一定要具备读写能力。

表 8 是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掌握第二熟练语言的情况：76.7%的人第二熟练的语言是汉语，7.5%的人第二熟练的语言是哈萨克族语，1.1%的人是维汉双语同样熟练，其他还有个别人第二熟练的语言是维吾尔语、英语、俄语或者汉哈双语水平差不多。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还可以看到，伊宁市维吾尔族居民第二熟练语言的习得时间主要是在儿童时期、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其比例分别占到总体的 31.8%、25.5%和 33.6%。第二熟练语言的习得方式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36.9%），其次是工作需要（28%），同学、家人、朋友的影响作用比较小。

表 8 伊宁市维吾尔族居民第二熟练的语言

	频数	百分比
没有第二熟练的语言	37	10.6
维吾尔语	7	2.0
汉语	267	76.7
哈萨克语	26	7.5
英语	3	0.9
俄语	2	0.6
维汉同样熟练	4	1.1
汉语和哈萨克语同样熟练	2	0.6
总计	348	100

四、语言使用

语言使用是人们实际运用语言的外在行为，它是一个内容非常广泛的一个概念，它可以包括人们在运用语言变体进行交流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语言变体（variety）指的是语言的不同表现形式，可以定义为社会分布相似的一套语项，包括通常称做语言、方言和语域（register）方面的所有内容。¹ 各族群的语言也是一种语言变体。

在双语或者多语社会中，掌握双语或多语的人常常会根据具体的情境来选择使用不同的语言变体。乔舒亚·费希曼（Joshua A. Fishman）认为“领域”这个概念能够将人们在具体微观环境中个人语言的选择和宏观的社会文化、制度环境连结起来。领域是“由共同的行为准则的集合特别约束的社会情景组合”²，他将其他学者归纳出来家庭、友谊、宗教、教育、就业五个领域明确地确定下来，并论证了领域构念的有效性。³在本研究中，我们选择了家庭、友谊、日常生活、学校、工作等五个与生活、工作密切相关的领域，然后将这五个领域进一步细分出不同的场合。

1、家庭领域

在家庭领域中，我们区分出祖父辈、父辈、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孙子女等不同代际之间的语言使用情况。从表 9 中可以看到，维吾尔语仍然是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在家庭中使用的主要语言，但汉语也成为其家庭用语之一，且在不同代际之间维汉语言的使用上存在一定差异。

¹ [英]R.A. 赫德森著、丁信善等译，《社会语言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3，第 31~32 页。

² 乔舒亚·费希曼（Joshua A. Fishman），“研究‘谁在何时用何种语言向谁说话’过程中微观与宏观语言社会学之间的关系”，祝畹瑾编《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97 页。

³ 同上，第 87~94 页。

具体来讲：在与祖父母辈交谈时，全部用的都是维吾尔语；在与父母辈、兄弟姐妹、配偶等不同代际的家庭成员交谈时，98%左右的维吾尔居民使用的都是维吾尔语；在与子女交谈时，主要使用维吾尔语的比例下降为 90.2%，还有 8.1% 的人是维吾尔语和汉语都用。

表 9 伊宁市维吾尔族居民家庭语言的使用情况（百分比%）

	祖父母辈	父亲	母亲	兄弟姐妹	配偶	子女	孙子女
维吾尔语	100.0	99.1	98.8	97.8	97.9	90.2	97.9
汉语	0.0	0.5	0.4	0.7	0.7	1.7	0.0
以维吾尔语为主，汉语次之	0.0	0.8	0.8	0.4	1.4	7.1	2.1
维吾尔语和汉语差不多	0.0	0.0	0.0	1.1	0.0	0.7	0.0
以汉语为主，维吾尔语次之	0.0	0.0	0.0	0.0	0.0	0.3	0.0
有效样本数 (n)	-	213	251	268	282	295	48

注：祖父母辈包括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等。

2、日常生活领域

我们把日常生活领域区分出和邻居交谈、集市（巴扎）买东西、大商场买东西、医院看病、政府部门办事、看电视、读书看报等常见的各种生活场景。在日常生活领域当中，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主要还是使用维吾尔语，维汉双语的使用也比较普遍，仅使用汉语的比例并不高。

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在和邻居交谈的时候，84.1%的人主要使用维吾尔语，11.5%的人使用的是维汉双语，主要使用汉语的只有 4%。在伊宁市总人口当中，维吾尔族人口所占的比例最高，如果从社区层次看，维吾尔居民形成了很多聚居区，他们的邻居主要是维吾尔族，因此邻居之间相互交谈主要使用维吾尔语是很自然的事情。

对于购物活动，伊宁市维吾尔族居民无论在集市（巴扎）还是在大商场，还是以维吾尔语的使用为主，但也存在一定差别。在集市（巴扎）买东西这个场景中，维吾尔族居民最主要的语言模式是维吾尔语，56.2%的人说自己主要使用维吾尔语，总计有 38.6%的人使用维吾尔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在大商场购物的场景中，使用维汉双语的比例上升为 48.8%，使用维吾尔语的比例下降为 32.1%，还有 17.6%的人主要使用汉语。

在看电视、读书看报等休闲娱乐活动中，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主要使用的仍然是维吾尔语。对于电视节目的选择，半数多的维吾尔族居民主要看维吾尔语的节目，近四成的人维吾尔语和汉语节目都看，少部分人主要看汉语节目。对于读书看报的文字选择，在具有一定阅读能力的维吾尔族居民当中，绝大多数（81%）主要看维吾尔语的报刊图书，少部分人是维吾尔语和汉语的都看或者主要看汉语的报刊图书。

表 10 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情况（百分比%）

	邻居 交谈	集市（巴扎） 买东西	大商场 买东西	医院 看病	政府部 门办事	看 电视	读书 看报
维吾尔语	84.1	56.2	32.1	25.4	31.5	53.9	81.0
汉语	4.0	3.7	17.6	20.5	19.7	7.5	6.4
维吾尔语和汉语差不多	4.9	24.8	28.3	23.3	22.6	17.4	8.0
以维吾尔语为主，汉语次之	4.6	11.5	16.2	21.6	17.4	11.9	1.9
以汉语为主，维吾尔语次之	2.0	2.3	4.3	7.8	8.2	7.5	2.3
哈萨克语	0.0	0.0	0.0	0.0	0.0	0.9	0.0
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	0.0	0.0	0.0	0.3	0.0	0.6	0.0
其他	0.3	1.4	1.4	1.2	0.6	0.3	0.3
有效样本数	347	347	346	347	340	345	311

在医院看病、政府部门办事这两个场景中，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的语言使用模式是以维汉双语为主，且使用维吾尔语略多一些。伊宁市维吾尔族居民在医院看病时，有半数多的人是维吾尔语和汉语都用，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主要使用维吾尔语，还有两成的人主要使用汉语。政府部门办事场景中的语言使用情况和在医院看病场景中的情况差异不大。伊宁市维吾尔族居民是否专门找本民族的医生和办事人员呢？调查数据显示，在医院看病时，伊宁市维吾尔族居民当中有35.3%的人会因为语言交流问题而专门找本民族的医生看病，29.5%的人选择的是“不会，不在意医生是哪个民族”，24.9%的人选择的是“不会，只要医术高就可以了，哪怕语言不通”，10.1%的人没有想那么多。在去政府部门办事的时候，伊宁市维吾尔族居民当中有41.7%的人说不会专门找本民族的办事员，只要把事办成就行了，不在意办事员是哪个民族；40.9%的人选择的是会专门找本民族的办事人员，因为讲本族语比较容易交流；16.2%的人说没想那么多。总之，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当中，有40%左右的人会因为语言交流而专门找本民族的医生或者办事人员。

3、友谊领域

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在与朋友交谈时绝大多数使用的还是维吾尔语，只有少部分是维吾尔语和汉语两种语言都用（见表11）。朋友相互交谈时使用的语言是和朋友的族群构成情况密切相关，数据分析还显示，半数的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的朋友全部是本民族的，四成多的人的朋友是本民族的占大部分。在和朋友交谈的时候，伊宁市维吾尔族居民是根据什么来选择使用哪种语言的呢？他们的选择依次是：52.6%的人选择了“根据自己会用的语言”，26.9%的人选择了“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23.1%的人选择了“看对方民族，尽量使用对方的语言”，15%的人选择了“看对方会哪种语言，尽量选择使用最有利于交流的语言”。

4、学校领域

在学校领域中区分出小学、初中、高中（技校、中专）、大学等不同教育阶段时的情况。伊宁市维吾尔族居民在上学期期间，主要还是用维吾尔语和同学交谈，但是随着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不同教育阶段的变化，使用维吾尔语的比例逐渐降低，而使用汉语的比例逐渐增加（见表11）。调查数据显示，在上小学的时候，伊宁市维吾尔族居民当中有92.3%的人和同学交谈时用的是维吾尔语，6.2%主要使用汉语，只有0.9%的人用了维吾尔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初中阶段和小学阶段的语言使用情况差别不大；到了高中（包括中专和技校）阶段，上过高中的维吾尔族居民中主要使用维吾尔语和同学交谈的比例下降为82.9%；到了大学阶段，在那些上过大学的维吾尔族居民当中，有一半的人主要用维吾尔族语和同学交谈，分别还有两成多的人主要使用汉语或者维汉双语。

表11 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与朋友、同学交谈时的语言使用情况（百分比）

	朋友	小学同学	初中同学	高中（技校、中专）同学	大学同学
维吾尔语	78.4	92.3	90.6	82.9	52.3
汉语	0.6	6.2	7.2	9.1	22.7
维吾尔语和汉语差不多	4.3	0.0	0.4	1.8	13.6
以维吾尔语为主，汉语次之	11.5	0.0	0.4	3.0	4.5
以汉语为主，维吾尔语次之	1.7	0.9	0.8	1.8	4.5
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	1.7	0.3	0.0	0.6	0.0
维吾尔语、汉语、哈萨克语都用	1.2	0.0	0.0	0.0	2.3
其他	0.6	0.3	0.8	0.6	0.0
有效样本数	347	325	265	164	44

5、工作领域

在工作领域中，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还是较多地使用维吾尔语，但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

模式也存在一定差异。当和同事一般性的交谈时，在那些曾经工作过或者现在正在工作的维吾尔居民（也就是排除了那些从来没有工作过的人群，例如学生、家庭妇女等）当中，44%的人主要使用维吾尔语和同事交谈，37.3%的人使用维吾尔语和汉语两种语言，14%的人主要使用汉语。当他们和同事谈工作的时候，主要使用维吾尔语的比例下降到了31.2%，与此同时使用汉语和维汉双语的比例都有所上升。当在开会这样一个较为正式、且有多人参加的场合里，有六成多的人回答说单位开会主要使用的是汉语，主要使用维吾尔语的比例则下降到了不到20%，使用维汉双语的比例也下降到了15.1%。可以看出，在工作领域当中，讨论的话题越正式，工作的场合越正式，汉语的使用就越多。

表 12 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在工作领域中的语言使用情况（百分比）

	和同事一般性的交谈	和同事谈工作	单位开会用语
维吾尔语	44.0	31.2	19.2
汉语	14.0	19.7	65.4
维吾尔语和汉语差不多	15.3	17.2	4.6
以维吾尔语为主，汉语次之	12.0	15.3	3.1
以汉语为主，维吾尔语次之	10.0	13.4	7.7
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	2.0	0.6	0.0
维语、汉语、哈萨克语都用	2.0	1.9	0.0
其他	0.7	0.6	0.0
有效样本数	150	157	130

五、语言态度

语言态度是人们对语言或者语言行为所做出的评价和判断，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它可以涵盖人们所有的对语言本身（包括各种语言变体）、语言使用和语言行为的各种看法。在进行语言态度研究时，不同的学者会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选择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调查，不同的学者也会设计不同的测量方法和指标。¹我们的研究关注的是在新疆这个多族群共同居住的地方，各族群对本族群语言的认同和评价以及对族际共同语汉语的态度，因为这会影响到人们学习和使用本族群语言和汉语的行为倾向。具体来讲，对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语言态度的调查内容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对维吾尔语、汉语的语言情感，对维吾尔语、汉语的社会功能及社会地位的评价，对语言作为族群象征的评价，对语言转用的看法，学习汉语、本族群语言、其他族群语言的意愿，对学校族群结构、教学语言类型的期待等等。

1、对维吾尔语的态度

表 13 是一个测量维吾尔族对本族群语言维吾尔语的态度量表，它涉及对语言的情感、认同、功能三个方面的评价。这 13 个问题也可以构成一个整体的量表来测量语言态度并用来在各个族群之间进行比较。对这 13 个指标做项目分析（item analysis），它们的同质性信度系数是 0.687（即阿尔法系数，通常是 Cronbach's Alpha），达到了量表编制的最低可接受范围。

调查数据显示出，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对维吾尔语有着很深厚的感情，绝大多数人把维吾尔语看成维吾尔族的族群象征，对维吾尔语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的评价则较为客观。先来看有关语言情感方面的问题，95%以上的人都认可维吾尔语是一种很好听的语言、维吾尔语听起来要比其他语言更亲切这些说法；还有近七成的人同意“维吾尔语要比其他语言更优秀”的说法；还有半数的维吾尔居民表示当听到维吾尔族人不用维吾尔语交谈时会感到不舒服。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的工具，它也是族群文化重要的附着体，人们会在语言上倾入自己强烈的感情，这几个

¹ 陈松岑，《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的影响》，《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 年第 1 期，81 页；Axler, M¹ 基金项目：201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新疆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的实证研究”（10YJC840102）；

问题都是一些纯粹主观性的感受性的问题，它们能够很好地反映出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对本族群语言的热爱。

表 13 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对维吾尔语的态度

	各态度维度的百分比				
	非常同意	同意	说不清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维吾尔语是一种很好听的语言	59.4	39.7	0.9	0.0	0.0
维吾尔语要比其他语言更优秀	24.9	43.0	22.5	9.6	0.0
维吾尔语听起来要比其他语言更亲切	36.3	59.6	3.2	0.9	0.0
当我听到两个维吾尔族人不用维吾尔语交谈时，我会感到很不舒服	12.8	40.6	8.7	36.5	1.4
会用维吾尔语是维吾尔族的根本象征	53.8	43.5	1.5	1.2	0.0
如果一个人连维吾尔语都不会，就不能算是维吾尔族	22.7	51.2	7.8	16.6	1.7
维吾尔语是一种很有用的语言	49.7	44.5	4.0	1.7	0.0
在我的生活交流中，维吾尔语足够用了	9.6	41.0	3.8	44.5	0.9
只会维吾尔语不能满足工作需要	14.0	65.0	5.0	14.9	1.2
维吾尔语只能在维吾尔族当中使用，应用范围不够广	7.6	37.3	15.2	39.1	0.9
维吾尔语只能在新疆使用，在中国的应用范围不如汉语广	15.4	64.1	10.7	9.6	0.3
维吾尔语可以在其他一些中亚各国使用，使用范围比汉语还要广	5.5	27.2	43.2	23.2	0.9
维吾尔语的使用有助于新疆的繁荣好发展	23.8	59.7	12.8	3.8	0.0

语言除了交流的作用之外，它还有非常强烈的象征意义，它也是关系到族群存在和族群认同的一种文化上的象征物。关于维吾尔语与维吾尔族族群认同的关系，有 97.3%的伊宁市维吾尔族居民都赞成“会用维吾尔语是维吾尔族的根本象征”，73.9%的赞成“如果一个人连维吾尔语都不会，就不能算是维吾尔族”这种说法。语言在很多情况下是成为某族群成员资格的一个重要要素，从这两个百分比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维吾尔族居民都把维吾尔语和维吾尔族的族群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不会使用维吾尔语也就可能意味着丧失了拥有维吾尔族族群身份的资格。

对于维吾尔语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多数认为维吾尔语在自己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工作中仅有维吾尔语是不够的，维吾尔语的使用范围不是很广。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有四成多的维吾尔族居民认为生活中仅懂维吾尔语是不够的，有近八成的人认为只会维吾尔语不能满足工作需要。从族群、社会的角度来讲，有 44.9%的人认可“维吾尔语只能在维吾尔族当中使用，应用范围不够广”这种说法，有 79.5%的人认可“维吾尔语只能在新疆使用，在中国的应用范围不如汉语广”这个观点。可以看出，多数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对维吾尔语还是有比较客观的认识，认为维吾尔语的使用主要是在新疆、在本族群内部。对于到“维吾尔语的使用有助于新疆的繁荣和发展”这个问题，83.7%的维吾尔族居民都持肯定态度。

2、对汉语的态度

接着分析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对汉语的态度，他们对汉语的情感、功能、地位等各方面的评价基本都持赞同或肯定的态度。首先来看对汉语的情感，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对汉语是一种友好、尊重、接纳的态度：有近九成表示希望能够讲流利而准确的汉语，七成左右的人表示和汉族人交流时喜欢用汉语、使用汉语时也并不感到尴尬，有六成多的人都同意“汉语是一种很好听的语言”这种说法。其次关于使用汉语使用和维吾尔族族群意识的关系，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较少地把使用汉语和维吾尔族的族群意识联系在一起，有四分之三的人不赞成“如果我使用汉语，就意味着我的维吾尔族身份意识淡化了”这种说法。

表 14 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对汉语的态度

	各态度维度的百分比
--	-----------

	非常同意	同意	说不清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汉语是一种很好听的语言	6.4	59.9	25.0	8.4	0.3
我希望我能够讲流利和准确的汉语	28.9	60.9	5.5	4.7	0.0
我和汉族人交流时，喜欢用汉语交流	15.5	63.6	12.9	7.3	0.6
当我使用汉语的时候我并不感到尴尬	10.0	58.8	10.9	18.2	2.1
当我听到一个维吾尔族人用汉语和其他人交谈时，我感到不自然	3.5	25.7	14.5	54.6	1.8
当我使用汉语时，我一直能感觉到自己是维吾尔族	30.2	58.3	10.9	0.9	0.0
如果我使用汉语，就意味着我的维吾尔族身份意识淡化了	2.1	13.9	9.7	60.5	13.9
汉语是一种很有用的语言	18.6	74.2	4.6	2.3	0.3
如果我能够熟练地使用汉语，我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31.7	60.2	5.2	2.6	0.3
如果我能够熟练地使用汉语，我能够顺利地适应工作	29.7	62.1	5.0	2.6	0.6
汉语的使用有助于新疆的繁荣和发展	15.1	73.0	10.4	1.4	0.0
汉语作为新疆地区在公共场合使用的主要语言，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14.2	55.8	15.7	13.4	0.9
如果我能够熟练地使用汉语，我的社会地位就能得到提高	14.7	50.0	14.1	20.0	1.2

注：该量表的同质性信度系数是 0.691。

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对汉语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评价都较高，多数人认为汉语有助于个人的就业和工作，有助于新疆社会的发展。从个人工作和就业角度来讲，伊宁市维吾尔族居民当中有九成多认为如果能够熟练地使用汉语，就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或者能够顺利地适应工作。从汉语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绝大多数的维吾尔族居民认为汉语的使用是有助于新疆的繁荣和发展的，同时也赞成汉语作为新疆地区在公共场合使用的主要语言，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关于会汉语和人们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当中有六成的人认为熟练使用汉语有助于社会地位的提高。

3、对维吾尔族中语言转用现象的看法、对汉族学习维吾尔语的看法

在维吾尔语使用当中存在着一种语言转用的现象，就是有些维吾尔族人已经不会使用维吾尔语了，他们由于各种原因转用了汉语。当然在新疆地区只有很少的一些人发生了语言转用，不是普遍的现象。维吾尔族人对这个现象怎么看呢？问卷中询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有些维吾尔族人已经不会使用维吾尔语了，您对这怎么看？”（可以多选）调查数据显示出，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当中有 60.5% 的人选择了“这样不行，把文化传统都丢掉了”，58.2% 的人选择了“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再经过几代人，维吾尔语的传承就会出现大问题”，14.6% 的人选择了“这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13.2% 的人选择了“他们的人数很少，不会影响维吾尔语的使用和传承”。

对于“汉族是否需要学习维吾尔语”这个问题，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当中有近九成的人认为汉族居民也应当学些维吾尔语，其原因主要是便于双方交流，比如有 78.3% 的人选择了“应当学，因为在新疆这里维吾尔族人多，学了好交流”。同时，维吾尔族居民也把汉族学习维吾尔语看成了族群之间表达平等、尊重的一种方式，有 62.5% 的人选择了“应当学，学习是双向的，不应当只是我们学习汉语”，还有 49.4% 的人选择了“应当学，因为这也是对维吾尔族的尊重”。

4、对学校类型、教学语言模式、孩子掌握语言的期待

在我们有关语言态度的调查中，我们还特别关注了各族居民对新疆学校教育中学校类型、教学语言类型有什么样的期望，以及学习本族群、汉语、其他语言的期望。

新疆自五十年代以来，主要实行的汉族学生（包括回族学生）进入汉族学校就读，少数民族学生根据本族群的语言进入民族学校就读（新疆的中小学可以根据本地实际采用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族语、蒙古语、锡伯、俄语等 7 种语言进行教学）的政策，也就是民汉分校。在不多的民汉合校的学校里，也大都实行的是民族学生和汉族学生分班按各自的教学语言授课。在民族学校和民族班的教学中，教学模式一般有用民族语言授课加授一门汉语课、

用民族语言授课不加授汉语课两种。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新疆开始在一些民族学校或者民族班进行双语教育实验，一些课程用本族群语言上，一些课程用汉语上。从 2004 年开始，又逐渐开始实验全部课程用汉语授课，同时加授母语语言课的教学模式。作为在新疆长期生活的各族居民，如果让他们从各自的生活经历和教育经历出发，他们会对学校类型和教学语言模式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表 15 伊宁市维吾尔族居民对学校族群结构类型和教学语言类型的选择（%）

	民族学校	汉族学校	民汉合校 但民汉不合班	民汉合校 且民汉合班
用维吾尔语授课，再学一门汉语	75.3	-	55.7	9.0
用维吾尔语授课，不学汉语	4.9	-	0.0	1.9
有些课程维语上，有些课程汉语上	17.3	-	33.0	52.6
用汉语授课，再学一门维吾尔语	1.2	68.2	11.4	35.9
用汉语授课，不学维吾尔语	0.0	13.6	0.0	0.0
其他	1.2	18.2	0.0	0.6
有效样本数	81	22	88	156

对于学校族群结构类型这个问题，我们询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综合考虑，您觉得在新疆以下哪一种学校更好？”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的选择依次是：44.8%的人选择了民汉合校并且民汉合班，25.7%的人选择了民汉合校但是民汉不合班，23.3%的人选择了民族学校，6.3%的人选择了汉族学校。这样总共有七成是赞同民汉合校，且赞同民汉合班的人也有四成多。一部分维吾尔族居民赞同民汉合校或者民汉合班可能是出于如下原因，一是可以促进维汉之间的交流从而有利于维吾尔族提高汉语能力，二是可以提高民族学校的教学质量。

在调查对象选择了学校类型之后，紧接着询问了一个关于教学语言选择的相倚问题。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的选择比较分散，并没有集中在某一种类型，其对教学语言模式的选择依次是：36.1%的人期待“用维吾尔语授课，再学一门汉语”，35.7%的人期待“有些课程用维吾尔语上，有些课程用汉语上”，23.3%的人期待“用汉语授课，再学一门维吾尔语”。从这样的选择比例可以看出，维吾尔族居民对教学语言模式的期待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从表 15 中还可以看到，在认可不同学校类型的维吾尔族人当中，对教学语言模式的偏好是不太一样的，认可民族学校和民汉合校但不合班的维吾尔族居民认为用维吾尔语授课加授一门汉语的模式较好，认可民汉合校且民汉合班的人则认为用维汉两种语言同时授课的模式较好。

对于期待孩子掌握的语言，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普遍选择了维吾尔语、汉族、英语三种语言，希望孩子能够掌握维吾尔语的人有 97.1%，希望孩子掌握汉语的有 92.2%，希望孩子掌握英语的有 75.3%，其他选择了俄语的有 23.6%，选择了哈萨克族语的有 10.9%。对于本族群语言维吾尔语，调查数据显示 94.5%的人希望孩子能够熟练地掌握听、说、读、写能力，其他极少数人认为用维吾尔语进行熟练的口语交流就可以了；对于汉语，伊宁市维吾尔族居民的期待也是很高的，有八成的人希望孩子能够熟练地掌握汉语的听、说、读、写能力；对于孩子掌握英语的程度，伊宁市维吾尔族居民当中有近七成的人希望孩子能够熟练地掌握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

六、小结

从以上的描述分析中可以看到，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绝大多数都掌握了维吾尔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其中多数能够用汉语进行简单的对话交流，能够熟练地使用汉语的比例并不高，只有极个别的人转用了汉语；他们最熟练的语言、和第一语言基本上都是维吾尔语，也有小部分人选择的是汉语或者维汉双语。家庭用语还是维吾尔语，但是汉语也成为小部分维吾尔族居民的家

庭用语之一；在与邻居、朋友、同学交谈时，多数使用的还是维吾尔语；在日常生活领域，语言使用模式有主要使用维吾尔语和使用维汉双语两种；在工作领域中汉语的使用比例进一步上升，尤其是在单位开会的场景中。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非常热爱自己的语言，大多数人把维吾尔语看成维吾尔族的族群象征；他们对汉语多持尊重友好的态度，希望自己能够讲流利准确的汉语，认为会汉语对就业和工作有很大帮助；出于交流方便和尊重的目的，他们希望汉族人也能够学习维吾尔语；对于族群结构的类型，他们多数倾向于民汉合校，对学校教学语言类型的期待则是多样化的。

以上的数据和描述分析其实相当于一次“照相”，大致较为清晰和全面地记录下来在 2011 年初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的语言能力、语言使用、语言态度情况。如果想要了解多族群共同居住地区有关语言情况的全貌，需要对该地区中各个族群进行详细描述。在对伊宁市城市居民的研究中，也就是至少还需要详细描述汉族、哈萨克族、回族等族群的语言能力、语言使用、语言态度情况，这篇论文只涉及了维吾尔族的情况。

语言调查首先应该起到的最基本作用是能够对语言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准确而清晰的“照相”，但语言调查又不能仅仅起到“照相”的作用。其实语言是我们认识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尤其是在多族群共同居住的地区，有关语言的各方面情况可以反映出当地学校教育的状况、各族群之间交往的状况、人们对族群关系的认识等等。当然，这需要对数据进行更深入的挖掘，或者配合其他方面调查资料来深入分析。限于篇幅，本文只就上述调查中的某些问题进行简单的分析和讨论。

首先在语言能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多数掌握维汉两种语言，他们都能够熟练地使用本族群语言维吾尔语，对于汉语多数人只是能够用汉语进行简单对话交流，能够熟练地用汉语进行交流和阅读的比例并不高。这样一种双语能力表明多数人是完全可以应对日常生活的语言需要，但是这种低水平的汉语能力使他们的社会流动和发展会受到一定限制。就全国范围来看，或者就新疆多数地区而言，汉语无疑已经成为各族群之间交往的族际共同语；而且就语言传递信息的工具性来看，汉文无疑是中国各种语言当中承载信息量最大的语言。如果一旦脱离原有的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生活圈子，或者想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就业岗位、追求更高的学业、谋求人生更好的发展等等，这些都需要以熟练的汉语能力为基础。

除了低水平的汉语能力可能影响到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的社会流动和发展之外，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目前还有 11.2% 的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完全不懂汉语。对于这些人，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国家和社会是否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服务，例如在医院看病、政府部门办事、银行和邮电部门办理业务等等场合。结合调查中的另一个问题，有四成多的维吾尔族居民会因为语言问题而专门找本民族的医生或者办事员，但如果医院某科室或者政府某部门恰好没有维吾尔族人，且汉族医生或办事员恰好也不会维吾尔语（这种情况是常见的），那么不仅会耽误病情或办事，也会间接伤害了当事人的感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当中规定，要保障各族群成员使用本族群语言文字的自由，但是如何采取具体细致的措施来保障呢？汉语、哈萨克语等语言的使用同样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其次在语言使用方面，在日常生活领域、工作领域中伊宁市多数维吾尔族城市居民会同时使用维吾尔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实际上他们大多数时候是遇到维吾尔族人时用维吾尔语、遇到汉族人是用汉语，因为伊宁市汉族城市居民当中只有 14.3% 的人能够用维吾尔语进行简单对话交流。这反映出来维吾尔族居民和汉族居民交往时存在的语言使用的单向性，再加上语言能力的限制，会使得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之间的交往处于一种相对隔阂的状态。此外，调查数据显示出汉语在工作领域当中使用较多，尤其是在单位开会的时候，也就是说汉语更多的和正式场合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这有没有造成一种事实上高低语的现象？如果没有，那就要继续保

持各语言的平等地位；如果有，就要考虑如何采取具体措施消除这种语言地位上的差异。

再次在语言态度方面，有很多问题需要关注。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非常热爱和珍视维吾尔语，多数人不能接受语言转用现象。语言这种文化特质作为族群的象征，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对任何一个有着自己语言的族群都有重要的意义。在制定和执行语言政策、教育政策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各族人民的心理。随着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逐步展开，维吾尔族中语言兼用甚至转用的现象可能会越来越多。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维吾尔族人对语言转用现象的担忧，在实践中要能够实现真正的维汉双语并行使用。

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多数很希望能够讲流利的汉语，这种强烈的学习汉语的需求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实用性的考量。尽管有这样的愿望和需求，我们仍然要特别注意的是对汉语的学习一定要建立在自愿选择的基础上。调查数据显示出他们对学校族群结构和教学语言类型的需求是多样的，而且不同的孩子对不同教学语言类型的学习适应能力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如果强制性地推行某种模式的双语教育，可能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在现代社会，学校教育是获得熟练语言能力的主要场所，尤其是第二语言。对于维吾尔族人来讲，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既能够熟练地掌握维吾尔语以保持本族群的文化传统，又能够熟练地使用汉语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从前文的调查分析中可以看到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多数接受的是以维吾尔语为教学语言的民族教育，这很好地保持维吾尔语的文化传承，但同时也造成了汉语水平普遍偏低。目前，新疆在推进的以汉语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双语教育可能可以解决维吾尔族人汉语水平普遍偏低的问题，但维吾尔族人是否都接受这种教学语言类型的教育、是否能够做到维吾尔语和汉语同样熟练、如何和原有的民族教育在各方面进行衔接、如何保持维吾尔语的熟练听说读写能力等等问题，都还需要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语言现象不能仅仅被看成是单纯的语言现象，它从来是要和具体的社会指向连接在一起，语言的工具性和象征性也总是会纠缠在一起。绝大多数伊宁市维吾尔族城市居民认为汉族人也应该学习维吾尔语，他们看重的不仅仅是方便双方交流，他们也把相互学习语言看成是一种表达尊重的方式，汉族人学习和使用维吾尔语对他们来讲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伊宁市汉族城市居民的调查数据显示出有六成多的人认为汉族人也应该学习一些维吾尔语，其目的则主要是出于在新疆生活与维吾尔族交流方便，并且提出对维吾尔语的学习不用学到非常精通的程度，只要能够用维吾尔语进行对话交流以应对日常生活需要就可以了。基于这些情况，应该可以考虑在新疆的各级各类汉族学校开设一门维吾尔语课程，通过语言的相互学习以增进双方的尊重和交流。

【论 文】

性行为与艾滋病感染风险

——新疆少数民族艾滋病性传播现状的社会学定性分析¹

祖力亚提·司马义² 曹谦³

摘要：面对新疆少数民族群体艾滋病流行日趋严峻的形势，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导致在面临艾滋病的危险时少数民族成为易受害的群体呢？我们认为形成这些风险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它受

¹ 基金项目：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新疆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的实证研究”（10YJC840102）；新疆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乌鲁木齐人口迁移与族际关系研究”（07020428061）

² 祖力亚提·司马义，维吾尔族，乌鲁木齐人，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

到政治、文化、经济以及在某一社会环境中生活个体的心理及行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是一篇以实际访谈调查和文献综述相结合的定性分析文章,试图讨论新疆少数民族的性行为和态度与艾滋病感染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新疆、婚姻习俗、性行为模式、耻辱、艾滋病感染

绪言

在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位于边缘地带,与诸多国家相邻,区域性毒品贸易长期存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文化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艾滋病的了解与防范相对较弱、性保护意识也较为薄弱等诸多因素,致使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成为艾滋病高发区,一些少数民族构成了感染者和发病者的主体。云南、新疆、广西和四川是艾滋病患者最多的地区,而这些地区都居住着大量的少数民族²。中国的少数民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只占到8%,但在登记的HIV 阳性病例中,少数民族占36%³。

一般来说,艾滋病的传播渠道主要有四种:1.与艾滋病携带者(HIV阳性)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接触到受感染的血液、精液或阴道分泌物;2.与带艾滋病菌的吸毒者共用针筒进行静脉注射;3.输入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成品;4.受感染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哺乳时把艾滋病毒传给婴儿。其中药物滥用(尤其是静脉注射吸毒)和性传播是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存在的高风险艾滋病传染途径。根据近两年的艾滋病监测结果表明艾滋病疫情静脉注射感染上升的幅度有所减缓。少数民族地区的禁毒任务取得一定成效,年报告感染者和病人数的环比增长率由2008年的16.8%降低到2009年的9.3%,2010年1-10月同比增长率下降了1.4%。由于少数民族安全性行为保护意识较为薄弱等诸多因素,性传播也逐步成为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的传播途径⁴。

根据关于亚洲地区的穆斯林社会报告,艾滋病的确对亚洲地区的穆斯林社区形成威胁⁵。新疆作为穆斯林民族聚居区,是中国艾滋病六大重灾区之一,不同民族吸毒者和艾滋病感染情况均有所不同。新疆周边地区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尔库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印度等艾滋病传播也较为迅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⁶。新疆在整个中亚地区的背景下,艾滋病的传播速度也不容忽视。维吾尔族是新疆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疆总人口将近50%,但吸毒人数占全疆总吸毒人数却远远超过50%,静脉注射毒品且共用注射器现象较严重⁷。吸毒是维吾尔族艾滋病感染者的主要传播途径之一,然而本文的主要切入点是从另一主要传染途径——不安全性行为出发,尝试性分析新疆少数民族的婚姻习俗、性行为以及艾滋病观念与艾滋病感染之间的相关性。

¹ 曹谦,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社会学硕士,从事民族社会学研究。

² Elin Lönn, Karin Sahlholm, Rena Maimaiti, Kaisaier Abdugarim, and Rune Andersson. AIDS Patient Care and STDs. January 2007, 21(1): 48-56. doi:10.1089/apc.2006.0063.

³ 于欣. HIV/AIDS 相关的精神卫生问题[Z]. www.xinqiao.net,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主办,

⁴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的官网网址:

<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hjbyfkzj/s3586/201011/49893.htm>

⁵ Kelley LM, Eberstadt N: Behind the veil of a public health crisis: HIV/AIDS in the Muslim world. NBP Special Report: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05

⁶ Hasnain, Memoona (2005). Cultural Approach to HIV/AIDS Harm Reduction in Muslim Countries. Harm Reduction Journal 2005, 2:23.

⁷ 曹韵贞,“艾滋病临床流行病学与预防控制前景”,《国外医学:流行病学传染病学分册》2002,29(1):1-4.

一、新疆少数民族婚姻习俗与艾滋病感染之间的关系

虽然当前社会存在一些无性婚姻，但婚姻的确是合法性行为的法律保障，因此婚姻与性的联系可以衍生到性与艾滋病的关系。事实上，不安全性行为是艾滋病传染的一个主要途径。在探讨新疆地区艾滋病问题时，我们绝不能撇开特定的民族社会文化、宗教信仰、道德伦理而仅仅从病理特征上去探讨艾滋病（Wang, 2006）¹。只有深入了解该民族的文化背景，民族心理，才有可能更好地了解艾滋病问题的内在实质（Painter et al., 2005）²。少数民族婚姻习俗影响着少数民族个体的性行为 and 性观念，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些新疆地区少数民族来说尤其如此。如今的社会（包括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婚姻在时代变迁中发生了诸多变化，婚姻的形式已经不像从前那么简单，而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结构与模式。在此有必要探讨新疆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中婚姻习俗的文化变迁。

（一）少数民族传统的婚姻习俗

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都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婚姻习俗。少数民族的婚姻习俗，是少数民族传统社会制度、民族文化、民族经济、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观念以及人文地理等诸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时它又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以下是关于新疆穆斯林社会中存在的一些普遍的婚姻习俗。

1. 传统的择偶方式

在穆斯林社会中，男女双方的择偶一般都按照《古兰经》、《圣训》教义的规定去执行，婚姻上还存在着诸多限制，如女子不得与非伊斯兰教的男子通婚，但是男子娶非伊斯兰教女子为妻，并能使其改信伊斯兰教，被视为善事；由父母做主和由媒人或邻里向青年男女的父母介绍择偶是很普遍的。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自由恋爱结婚则是非常少见的。提倡门第相当，本村本镇本地人之间的联姻。受伊斯兰教法及传统婚姻的影响，男子只要有经济能力，可多妻、重婚（二至四个妻子均可），不受自身或女方年龄的限制等。

2. 传统的婚姻观念

伊斯兰教认为，婚姻是穆斯林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圣行”，也是最严肃的一项义务。同时通过婚姻可以为人们带来许多物质的、道德的、伦理的社会利益，因此伊斯兰教鼓励穆斯林成婚，建立家庭，而反对独身主义。伊斯兰教在鼓励通过婚姻来满足性的需要的同时，严禁任何形式的婚外性行为。《古兰经》指出：“你们不要接近私通，因为私通确是下流的事，这行径真恶劣”。因为在伊斯兰教看来，私通必然导致血统的混乱，家庭的瓦解，社会的分崩离析，性病的流行，道德的沦丧，人格的丧失，人欲的横流。

传统的少数民族社会严格按照伊斯兰教教义，形成了保守的婚姻观念。强烈反对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离婚行为，提倡夫妻双方忠贞、信任的婚姻关系。

（二）少数民族现代的婚姻习俗

1. 自由恋爱择偶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不仅改变了新疆穆斯林社会旧的生产与社会结构，而且也逐渐改变了穆斯林旧的婚姻观、家庭观及生活观。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各种法律法规及宗教政策的制订和不断健全与完善，婚姻家庭从组成方式、结构、夫妇权利和地位以及其他各方面逐渐趋于合法化、合理化和人性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择偶习俗开始遇到诸多挑战。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各种信息的更新，使更多的年轻人开放起来，他们更多是提

¹ Wang, Ailing (2006). *Uses of Prevention of Mother-to-child Transmission of HIV Services: A Study of HIV-positive Women in Yining, Xinjiang, China*. Ph.D Thesis, Mahidol University

² Painter, T.M., et al. (2005).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articipation by HIV-1-positive pregnant women in an intervention to prevent mother-to-child transmission of HIV in Cote d'Ivoire. *Journal of STD AIDS*. 16(3): 237-242

倡自由恋爱择偶。

2. 婚姻道德的缺失，族内舆论压力的弱化

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都是传统少数民族婚姻观念中受到严重谴责和鄙视的，甚至会受到宗教法庭的处置。然而现代少数民族传统观念的淡化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或者离婚相对来说受到族内舆论压力的谴责和传统社会比较而言是微弱的。发生违反传统婚姻道德观的人们受到处置和关注的程度也不再是像以前一样那么严重，族内群众的舆论监督弱化，成为导致婚姻道德的缺失的重要因素。

（三）少数民族婚姻习俗的变化与艾滋病之间的关系

迅速发生着变迁的少数民族婚姻习俗，深刻地影响着新一代少数民族的性行为模式和性观念。对于部分人来说，宗教和传统的道德约束对于婚外性行为的约束力逐渐减弱，导致现代少数民族社会因各种原因，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发展迅速，加上由于缺失安全性行为的意识和保护措施，导致一些不洁性行为的发生和蔓延传播。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对于艾滋病的意识还较为淡薄，医疗服务体系相对落后，全方位体检频率较低，导致一些HIV阳性患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形成无意识的艾滋病毒传染源，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成为潜在的高危传染源。既然性传播是艾滋病传播主要途径之一，因此倡导婚姻体制内的合法性行为是减少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途径之一。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现代社会，婚姻家庭对于性行为的约束力显得较为单薄，因此减少艾滋病性传播需提倡安全性行为。加强艾滋病宣传防范是有效防治艾滋病的途径之一。少数民族婚姻体制对性行为的约束力逐渐减弱，婚姻在一些少数民族群体中不再是唯一的性行为发生条件，在这种社会变化下，婚姻与性的直接联系被淡化，因此抑制艾滋病通过性传播的关键是倡导安全性行为。

二、新疆少数民族的性行为与艾滋病感染之间的关系

（一）少数民族传统的性观念

少数民族穆斯林群众传统性观念主要受着伊斯兰教思想的影响，一向以严肃、保守而著称。新疆的少数民族穆斯林群众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穆斯林性文化。Takyi (2003) 指出宗教与艾滋病有着重要联系¹，由于一些宗教信仰，导致一些教徒不愿使用安全套，这使得艾滋病的感染源更为隐蔽。少数民族的性行为在社会文化的变迁下，发生了一些变化。

1. “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性行为

穆斯林社会一向以两性隔绝而著称。“男女授受不亲”的行为方式。在边远地区，维、回、东乡、撒拉族穆斯林妇女们，至今还严格地恪守着“家妇不见外男”的规矩。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群众传统性观念是严格按照《古兰经》和《圣训》的教义来约束自己行为的。新疆南疆的少数民族至今保留着女子遮面，以免陌生男子看到，甚至是夏天少数民族妇女也会穿很长的衣服来遮住肢体。在伊斯兰教中严禁女子过度暴露，过度暴露被认为是违反了伊斯兰教的旨意，增加了男子动邪恶念头的几率。在传统性行为中，宗教教义和社会道德约束力非常强。

2. 传统性需求

伊斯兰教提倡和鼓励通过合法的婚姻来满足性的需要。伊斯兰教对于性有其独特的认识和观点。伊斯兰教对性的态度，既不是禁欲主义，也不是纵欲主义，而是节欲主义。伊斯兰教认为，禁欲主义与纵欲主义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极端主义都是违背人的天性的。因为，在伊斯兰教看来，人既不是无饮食男女、纯洁无瑕的天使，也不是屈从本能的低级动物。

遵循伊斯兰教的教义，少数民族社会提倡性的满足只能通过婚姻来实现，任何婚外性行为都

¹ Takyi, B.K. (2003). "Religion and women's health in Ghana: insights into HIV/AIDs, preventive and protective behavior". *Social Science Medicine*. 56 (6): 1221-1234.

被视为非法和不道德,遭到鄙视。偶或有人胆敢越雷池一步,发生婚外性行为,就会身败名裂,被群众唾弃。根据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 1963)对耻辱(stigma)的定义(耻辱是不受欢迎的不同,伴随着社会上其他人的负面评价)¹,新疆少数民族在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下和宗教环境下,少数民族群体婚外性行为被视为是典型的耻辱行为,因此少数民族为了避免遭受他人的鄙视在宗教氛围环境与传统社会道德环境下会抑制自身的不良性行为的概率。

(二) 少数民族现代的性行为--性行为的逐渐开放

新疆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正在从封闭逐步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新疆的发展使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和人们的观念呈现多元化状态。国内外大量的信息猛烈冲击着传统保守的少数民族人们。一些接受现代文化熏陶较多的知识分子或公务员,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场国内外的“性革命”无所适从。更多的少数民族人已经不再谈性色变,“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性行为逐渐弱化,宗教和道德的约束力较弱。性,不再是避讳的话题,一些少数民族群体逐渐大胆摸索和尝试着性解放。这一时期社会道德的缺失开始明显。

“问:如果你和朋友突然得到了免费的享受婚外性行为的机会,你们之间几个人很高兴的抓紧这个机会呢?答:我估计可能会百分之50-60的人抓到这个机会。大概百分之30-40的人因害怕传染性病拒绝。”²

伊斯兰教文化强调性道德,禁止乱性。在一场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下,有些人性行为非常随便,婚外恋和婚外性行为层出不穷,卖淫嫖娼等丑恶现象开始猖獗。在调查中,大部分被访对象相信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五十的人存在婚外性行为和婚前性行为的现象。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也清楚地意识到宗教与传统社会道德对性的约束力逐步减弱,并提出了捍卫传统道德的看法。

“你了解你的同事、朋友或邻里是否存在婚外或非婚性行为?答:社会也很开放。性也开始开放了起来。现在婚前同居、婚外恋的这些事越来越多了。但我看来这类事不管宗教信仰也好,民族风俗习惯也好都是不允许的。我们应该制止,避免繁衍,和道德败坏。不管是谁都得加强自我管理,努力实现自我价值。”³

(三) 新疆少数民族的性行为模式与艾滋病感染之间的关系

少数民族性观念的转变对新疆艾滋病感染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少数民族传统性观念严禁婚外性行为和乱性行为,禁止私通。伊斯兰教对少数民族穆斯林的性行为有着强大的约束力。而如今宗教道德观念的弱化,使其传统的性观念开始淡化,婚外性行为,婚前性行为有普遍的走势。这给新疆地区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性,不再是少数民族人避讳的话题,甚至已经走上了“台面”,而婚外不安全性行为的发生的确给艾滋病的性传播提供了很好的温床。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性行为模式在新疆少数民族中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在西部大开发的浪潮中,新疆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发展不仅带来了财富的积累和物质的丰富,发展也使当地文化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模式和婚姻习俗,使少数民族性行为模式不再是单一的家庭性行为模式,而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性行为

¹ Goffman, E.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a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² 访谈材料: 2011314教师(男37)

³ 访谈材料: 2011326

模式的多样化、复杂化给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困难。以下将结合几种现代社会较为常见的性行为模式，阐述新疆少数民族日益多样化的性行为模式与艾滋病感染之间的关系。

常规家庭由父母子女三个要素组成，夫妻拥有单一固定性行为模式。合法家庭的单一性行为模式是国家及现代社会伦理道德所提倡的，也是少数民族传统社会和伦理道德、宗教信仰所认可的，但是随着少数民族社会传统宗教道德伦理观念的淡化和约束力的减弱，合法家庭性行为模式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一些少数民族形成了婚外性行为。这种性行为对象的特点是在合法婚姻家庭外，形成一个或多个事实上的婚外性关系。一旦形成了复杂的婚外性行为模式，感染艾滋病的潜在隐患会增大。婚外性行为选择的行为对象范围越广，感染的几率和隐患就越大。

少数民族婚外家庭性行为模式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通过调查资料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方面主要原因：

1. 对伴侣的不满意

“问：无论是男还是女在外找伴侣的目的是什么？答：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性方面不满意对方就找婚外伴侣。”¹

“问：您觉得他们出现这种婚外恋或者非婚性行为的原因是有有哪些呢？答：肯定有（对伴侣）不满意啊，就是因为有不满意，才去找别人的，我觉得。”

“问：哦，主要就是这个原因，是吗？答：嗯，对对对，这是最主要的原因。”²

通过分析大量的结构式访谈和半结构式访谈资料，可以看出对伴侣的不满意包括性方面的不满意和性不和谐成为发生婚外家庭性行为最主要原因。虽然在少数民族婚姻习俗中，自由恋爱已经成为主要的择偶方式，但是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父母、亲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迫于家庭压力而选择结婚对象。这导致了婚外情的发生概率要高于一般自由恋爱的家庭，进而发生一些婚外性行为。合法婚姻中的男女双方彼此缺乏吸引力，在性生活方面不和谐，正常的性生活在婚姻中得不到满足，导致一些少数民族发生婚外性行为。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平淡的夫妻生活，寻求刺激也导致了一些婚外性行为的发生。

2. 经济原因

“问：无论是男还是女在外找伴侣的目的是什么？答：经济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对男人来说钱多了就想找婚外伴侣，对女人来说为了钱或者办事只好选择那条路。”³

在少数民族发生婚外性行为的原因中，经济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新疆的发展不仅给新疆的少数民族人们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财富和金钱。经济能力的提高，使更多人不满足于单一固定的家庭性行为模式而在婚姻之外寻找短期或者长期的性伴侣，而这常常和性交易是分不开的。根据古兰经的宗教教义，在传统的伊斯兰宗教中是允许一夫多妻的，一个男性拥有多名妻子被视为是权威与男权魅力的具体体现，然而这与现代婚姻家庭制度倡导的一夫一妻制存在制度性的冲突。一些少数民族中的婚外性行为存在着性交易，或许是满足男性权威能力的虚荣心的一种外在经济表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WTO，2004），女性在性行为过程中由于其经济社会

¹ 访谈材料：2011318公务员（男40）

² 访谈材料：2011504公务员(女29)

³ 访谈材料：2011318公务员（男40）

文化地位相比较男性较弱，往往处于性行为的被动方，这导致女性在性行为中更易成为不安全性行为的对象，导致艾滋病感染¹。穆斯林社会里，男性往往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因此在性关系中通常是男性决定是否使用安全套，女性往往属于从属位置。根据调查资料，新疆少数民族群体中男性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还是非常低，女性在很多情况下，缺失要求男性使用安全套的话语权，这就意味着女性很容易成为艾滋病的感染者。根据 Elin Lönn et al. (2007)报告，性交易过程中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概率低于一半，这就意味着感染艾滋病的概率超过 50%。²

3. 各类聚会的增多

“问：你或其他朋友、同事存在婚外或非婚性行为的原因是什么？对自己的伴侣不满意？还是盲目的跟着别人学的？还是其他？答：现在工资也涨了，聚会多了。警察嘛，平时工作压力大，想的是在周末好好开开心，放松一下。有时会抽查夜店或者色情场所，接触这样的地方较多³”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的富足，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日益成为少数民族生活中的主流。同时，在少数民族社会里，各类名目繁多的聚会给婚外恋情以至婚外性创造了外在条件与机会。

3. 少数民族婚外家庭性行为模式给艾滋病的防治带来的隐患

(1) 性行为对象的不固定性和隐蔽性

婚外性行为给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带来的隐患可谓是巨大的，因为性行为对象的选择并不固定且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这便给寻找艾滋病的感染源头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尤其是少数民族由于受到伊斯兰教伦理道德的约束，婚外性行为更具有隐蔽性。因为已婚者，无论是男还是女，不希望自己的婚外性行为被别人发现，其原因是，少数民族社会里，婚外性行为还是或多或少的受到舆论压力的谴责。

(2) 对另一半感染几率的绝对性

在家庭中出现婚外性行为一方，如果在婚外性行为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在多数情况下，会把病毒传染给婚姻中的另一方。家庭婚姻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性行为，而且在家庭固定性行为模式中少数民族使用安全套的意识比较淡薄。类似情况的存在使无辜的另一半感染病毒的几率增大，婚姻中只要有一方有婚外性行为，那么婚姻中的另一方就存在潜在危险。

除了婚外性行为以外，单一情侣性行为模式是以情感为基础，属于婚前性行为，是情侣最为热烈幸福的形态，可能走入婚姻，亦有可能终止。多情侣模式主要包括一方或双方同时有几个相对固定的情侣，存在婚前性行为，走进婚姻的机率较小。

随着时代的发展，少数民族中多情侣模式的性行为模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传统伊斯兰教中婚前性行为是绝对禁止的。少数民族传统习俗中存在婆婆以各种方法检查媳妇是否是处女的方法，如果女孩结婚时被发现不是处女，那么这个女孩的一生可谓是悲惨的，会是千人骂，万人唾的对象。然而日新月异的科技，纷繁多样的信息，四通八达的网络给少数民族年轻人的思想带来了一次革命性的风暴。这场风暴的最大亮点是思想的解放和传统道德观的弱化。传统社会中避讳的性自然被推到风口浪尖。

现在，在少数民族年轻人中“谈性色变”，“守身如玉”的程度相对低下。“早婚早育”在少数民族中渐渐成为昨日黄花，“晚婚晚育”则是大力提倡的香饽饽。晚婚晚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¹ WTO. (2004) *Women's Vulnerability to the Epidemic is Increasing Throughout the World*.

² Elin Lönn, Karin Sahlholm, Rena Maimaiti, Kaisaier Abdugarim, and Rune Andersson. *AIDS Patient Care and STDs*. January 2007, 21(1): 48-56. doi:10.1089/apc.2006.0063.

³ 访谈材料：2011323 特警（男36）

遏制了人口的增加，但是也在另一方面给性行为带来了隐患，以至出现许多“享乐”主义。很多青壮年已经到了结婚年龄却不打算很早走进婚姻，害怕婚姻的枷锁，其原因或许是拥有多个情侣。

在爱情的伟大号召下，婚前同居在少数民族年青人中越来越普遍，他们自身的性生理已成熟，处于性活跃状态，他们很难抵制性行为“享乐主义”的诱惑。在传统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少数民族年轻人受到的性教育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性知识大多来自网络和杂志。因此年轻人进行性行为时，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较差，这使年轻人成为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在任何艾滋病流行的地区，青年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亚人群¹。新疆的少数民族年轻人在我国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代少数民族年轻人的性观念正日趋开放，而与之相应的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意识和行为并没有相应提高，这种现象将增加年轻人感染性病艾滋病的风险。因此，应在大学等年轻人集中的场所中开展适时、适度、适量的性健康教育和正确的爱情观教育，既要进行洁身自爱的道德教育，又要正确宣传安全套在预防性病艾滋病中的作用，提高青年人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意识，进而提高青年人的自我约束与自我保护能力，降低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

另外，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卖淫性交易这种古老的行业在我国似乎又死灰复燃，并俨然有向规模化的“地下性产业”发展的趋势。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1998年全国公安机关共受理卖淫嫖娼案件189972件，处理189452件；1999年共受理案件216660件，处理215128件；2000年共受理案件225693件，查处222132件；2001年共受理案件242053件²。也就是说，近几年每年参与卖淫嫖娼的人员至少在200万以上³。性交易，不仅涉及到社会道德、社会秩序、人口问题等诸多方面，更是和艾滋病有着如胶似漆的关系。

伊斯兰教虽然严格禁止嫖娼卖淫行为，但是随着国内外各种文化的冲击下，少数民族社会中卖淫性交易，女性性工作者数量有所增多等问题也日益浮出水面，引起普遍关注。

(3) 性交易地点的多样化和复杂化

“问：你认为婚外性行为发生在何地场所？你有没有婚外性行为？答：我认为在宾馆、

酒店、桑拿发生婚外性行为。⁴”

在调查中，被问及婚外性行为或者性行为发生的地点时，许多被调查者回答酒店、宾馆、桑拿、夜店或者自己另购的私房里。近几年高档酒店、桑拿、洗浴中心在新疆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这不仅丰富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夜生活，更给地下隐秘性交易提供了便利，收入在中上水平的人都可以消费得起。因聚会、工作关系等原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光顾这些服务中心。许多人大多是女性“特殊服务”者也应运而生。

2. 少数民族交易式性行为模式对艾滋病的影响

当性传播成为除了静脉传播的第二大艾滋病传染源，中国的卖淫、嫖娼和性工作者已渐渐引起政府及社会的关注。一直以来以《古兰经》的教义约束自己行为规范的新疆穆斯林群众里的一部分人，在一场多元文化的选择下迷失了方向。有些人彻底摒弃传统伦理道德观，走向了极端。收入的增多使这一情况加剧。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性工作者和嫖娼情况不容乐观。

性交易的隐秘性给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从事性工作的又是社会下层低收入群体，他们的安全和防护意识相对差，还具有一定的被迫性，处于弱势地位。不管是性工作者还是嫖娼者都在一定客观条件下，不愿意暴露自己，更不愿意定期体检，害怕群体歧视。因此，交易性行为模式因存在范围广，发生条件便利，受害群体基础庞大，感染率大成为艾滋病感染

¹ 张思明、晏渠如、施少平等，“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态度的调查”，《中国全科医学》2004，12(23)：54-

² 黄小洵、傅华、商继政，“论性交易的法律治理”，《电子科技大学社科版》2009年第6期，10

³ 王刚、王元新，“论卖淫嫖娼的现状与对策”，《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4，(2)：98. 100.

⁴ 附录5:5-2011323教师

的高危传播模式。

四、总结

戈夫曼所定义的“耻辱”（耻辱是不受欢迎的不同，伴随着社会上其他人的负面评价）¹，在新疆少数民族群体中谈及艾滋病时是显而易见的。当前新疆的艾滋病传播的途径主要是吸毒和性传播，媒体宣传也主要是这两种艾滋病传播途径。当新疆少数民族群体中谈及艾滋病时，自然就会将艾滋病患者与不正当性行为或者吸毒者联系在一起。艾滋病这一名词所对应是媒体大规模所宣传的担忧，与之相伴随的是吸毒与性滥交等不良生活习性，进一步所附带符号信息即为道德沦丧与穆斯林社会中的宗教丧失与背叛²。然而正是由于社会（包括家庭婚姻，宗教等文化）对艾滋病所携带的负面耻辱符号，导致很多少数民族个体不愿意去接受HIV体检，隐藏HIV状态信息，加上少数民族群体对于安全性行为的意识较为薄弱，女性在性关系中的被动关系与男性在性关系中往往不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导致艾滋病的性传染源很难追踪与控制。

事实上一些艾滋病患者是由于母婴感染，或者输血时感染，或者无意间接触艾滋病毒感染源，这些本身都和耻辱行为本身无关。因此应适当将艾滋病的负面耻辱信息弱化，逐步让少数民族群体更多地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正确的医学常识，慢慢地引导少数民族群众主动咨询相关艾滋病的知识与并教会他们一些基本防范措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教育程度相对于较低，这使他们在接受艾滋病宣传时存在较大困难。在经济、教育相对落后的喀什巴楚、伊宁等县城，吸贩毒人员的文盲比例则更高。当前新疆地区艾滋病宣传活动绝大部分使用汉语，一些只操本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无法熟练使用汉语，因此，表面上艾滋病宣传活动似乎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但事实上大部分少数民族群体由于语言障碍对艾滋病仍然了解较少。

在调查中，少数民族群体使用安全套的比率相当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易受感染艾滋病的概率。当前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社会伦理道德和宗教的约束力逐渐减弱，对于性也不再是单纯地避讳和禁欲。艾滋病本身的传播并不与性行为直接联系，只有与艾滋病带菌者（HIV阳性）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从而接触到受感染的血液、精液或阴道分泌物才会感染上艾滋病。单纯地在少数民族群体中倡导减少性行为的方式来抑制艾滋病略显无力，因为健康的性生活是成年人的正常生活。只有加强安全性行为教育，在性行为发生时，采取安全性行为才是抑制艾滋病传播的另一有效途径。在当前的新疆社会，由于其宗教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虽然少数民族性行为广泛发生着（婚前或婚外性行为、同性性行为），但是为了避免宗教及社会家庭婚姻道德等谴责，大多数性行为都是在极为隐蔽的情境下发生，这加剧了性行为的隐蔽型，导致追踪艾滋病感染源的难度系数增大。

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其意义在于巩固和加强民族的文化生存空间，提倡传统道德的约束力，因为艾滋病冲击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躯体，而且也包括它的经济发展能力、社会发展能力、文化认同等。所以艾滋病对少数民族的危害是一个全方位的危害，而不仅仅是流行病学定义上的危害。这不仅关系到一个民族群体的健康和发展，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和国家利益。此外，社会应尽量避免歧视少数民族艾滋病患者，只有这样艾滋病毒携带者才有勇气去进行相关治疗，并有意识地避免传播艾滋病给其他无辜群体。

总之，艾滋病影响民族生存，社区发展，所有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均与此有关。本文对相关调查资料和文献的回顾，主要从婚姻习俗和性行为两个角度论述新疆少数民族中的艾滋病性传播的处境，指出在分析新疆少数民族艾滋病与性行为关系时需充分意识到少数民族特殊的历史、文

¹ Goffman, E.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a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² Liu H., et al. (2006) Understanding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HIV-related stigma, concern about HIV infection, and intent to disclose HIV serostatus: A pretest-posttest study in a rural area of eastern China. *AIDS Patient Care STDs* 2006; 20: 133-142

化、社会、宗教及其现代社会生存状态, 这样才可能制定适合少数民族的艾滋病防治政策, 推广针对少数民族的艾滋病防治。

参考文献:

- [1] 基金项目: 201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新疆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的实证研究”(10YJC840102); 新疆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乌鲁木齐人口迁移与族际关系研究”(07020428061)
- [2] 祖力亚提·司马义, 维吾尔族, 新疆乌鲁木齐人, 1978 年, 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 从事民族社会学研究。
- [3] Elin Lönn, Karin Sahlholm, Rena Maimaiti, Kaisaier Abdugarim, and Rune Andersson. *AIDS Patient Care and STDs*. January 2007, 21(1): 48-56. doi:10.1089/apc.2006.0063.
- [4] 于欣, HIV/AIDS 相关的精神卫生问题[Z]. www.xinqiao.net,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主办
- [5]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官网网址:
<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hjbyfkzj/s3586/201011/49893.htm>
- [6] Kelley LM, Eberstadt N, *Behind the veil of a public health crisis: HIV/AIDS in the Muslim world*. NBP Special Report: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05
- [7] Hasnain, Memoona 2005, “Cultural Approach to HIV/AIDS Harm Reduction in Muslim Countries”. *Harm Reduction Journal* 2005, 2:23.
- [8] 曹韵贞, “艾滋病临床流行病学与预防控制前景”, 《国外医学》(流行病学传染病学分册) 2002, 29 (1) : 1 - 4
- [9] Wang, Ailing (2006). “Uses of Prevention of Mother-to-child Transmission of HIV Services: A Study of HIV-positive Women in Yining, Xinjiang, China”. Ph.D Thesis, Mahidol University
- [10] Painter, T.M., et al. (2005).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articipation by HIV-1-positive pregnant women in an intervention to prevent mother-to-child transmission of HIV in Cote d’Ivoire. *Journal of STD AIDS*. 16(3): 237-242
- [11] Takyi, B.K. (2003). Religion and women’s health in Ghana: insights into HIV/AIDS, preventive and protective behavior. *Social Science Medicine*. 56 (6): 1221-1234.
- [12] Goffman, E.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a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 [13] 访谈材料: 2011314 教师 (男 37)
- [14] 访谈材料: 2011326
- [15] 访谈材料: 2011318 公务员 (男 40)
- [16] 访谈材料: 2011504 公务员 (女 29)
- [17] 访谈材料: 2011318 公务员 (男 40)
- [18] WHO. (2004) *Women’s Vulnerability to the Epidemic is Increasing Throughout the World*.
- [19] Elin Lönn, Karin Sahlholm, Rena Maimaiti, Kaisaier Abdugarim, and Rune Andersson. *AIDS Patient Care and STDs*. January 2007, 21(1): 48-56. doi:10.1089/apc.2006.0063.
- [20] 访谈材料: 2011323 特警 (男 36)
- [21] 张思明、晏渠如、施少平等, “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态度的调查”, 《中国全科医学》2004, 12(23) : 54
- [22] 黄小淘、傅华、商继政, “论性交易的法律治理”, 《电子科技大学社科版》2009 年第 6 期, 10
- [23] 王刚、王元新, “论卖淫嫖娼的现状与对策”, 《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4, (2): 98. 100.
- [24] 附录 5:5-2011323 教师
- [25] “深圳市男男性接触者异性性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华南预防医学》2010 年 4 月第 36 卷第 2 期

- [26] 向德平、吴丹,“艾滋病患者社会支持与生存质量的比较研究——基于对有偿供血人群、MSM 人群及女性性工作者的调查”,《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4期《艾滋病防治问题研究》
- [27] 刘刚等,“深圳市男男性接触者异性性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华南预防医学》2010年4月第36卷第2期。
- [28] Goffman, E.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a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29] Liu H., et al. (2006) “Understanding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HIV-related stigma, concern about HIV infection, and intent to disclose HIV serostatus: A pretest-posttest study in a rural area of eastern China”. *AIDS Patient Care STDs* 2006; 20: 133-142

【书 讯】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1930年代至1940年代》

(日本) 神戸大学教授 王柯著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3年出版

- 第一章 在“乌玛”与“中华”之间——清王朝对新疆维吾尔族社会的统治
- 第二章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起源——运动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发生形态
- 第三章 反日亲苏路线的表与里——盛世才的政治路线与新疆民族问题
- 第四章 政治权利的双重结构与民族问题——盛世才政权时期的政治路线和民族政策
- 第五章 苏联支持的中国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的“圣战”——第二次独立运动爆发和伊宁起义
- 第六章 权威与权力——战时体制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结构
- 第七章 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结合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势力扩张的苏联背景
- 第八章 国际政治游戏和“共和国”的悲剧——“新疆和平谈判”的前台幕后
- 第九章 “民族独立”还是“民族解放”——“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消亡
- 第十章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对第二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深入分析

封底介绍: 以往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研究,由于意识形态限制、资料匮乏、语言障碍等原因,往往局限于单一的民族视角,或简单概论式的叙述模式。本书首次对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进行了理性、严肃且深入的学术研究。日文版自1995年出版后,被公认为迄今为止关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最权威的研究著作。本书在日文版基础上经过了大幅度的充实及修订,增补了追究历史渊源的章节,加入作者新近的研究成果,推进了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在新疆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本书尤其难得的是涵盖了众多珍贵的一手史料:作者遍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导人的谈话、文章、信件等数百件重要文献,收集了大量运动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日本美国的外交资料等,采访了与共和国领导层关系密切的少数民族人士。在史料的基础上,作者从伊斯兰民族社会结构、民族革命思想的起源与质变、独立运动的内部结构和共和国的权力构造、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等方面,多角度地呈现与分析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政治过程和性质。研究深入独立运动内部,层层爬梳,严谨推度,一步步揭示出在以往宏大叙事的遮蔽之下,一段迷离扑朔的历史。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